



心靈環保與終身學習 不務正業的正業

許永河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專長為「總體經濟學、應用計量經濟、高齡經濟研究」等

壹、前言

從懂事以來，我就不斷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為什麼活著？做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從青澀的年紀開始，就一直在找「讓生命有用」的機會，也一直在嘗試一些被視為「不務正業」的事，嘗試為自己的疑問找答案。在世間法中，我被視為經濟學者，可是我又用很多課餘的時間，在不同的地方和許多人分享佛法，也嘗試結合經濟學與佛法，試圖對當代的社經問題，提供異於主流經濟學視角的思考。今天來這裡和各位分享的「佛教經濟學」，也是我不務正業的結果之一。

經濟學是有用的世間知識，佛法是解決生命苦惱的甘露；前者入世，後者出世。兩者看似互不相容，但作為一個承受佛法好處的經濟學者，我嘗試從自己所理解的佛法和藉以餬口的經濟學知識中，找到兩者間可以溝通而且對世間現象可以互補之處，這也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軸。我準備從幾個面向來和各位作分享，以下是今天討論的大綱：

- 一、從不務正業談起，談有「佛教經濟學」這專業嗎？
- 二、「佛教經濟學」——「正業」或「不務正業」，誰來定義？
- 三、把「不務正業」變成「正業」值得努力嗎？
- 四、生命的終極正業：「三業」人生的終身學習。

貳、從不務正業談起：有「佛教經濟學」這專業嗎？

談到「佛教經濟學」，很多人的第一個疑問是：有「佛教經濟學」嗎？因為在一般人的觀念中，只要談到經濟學，往往認為它是談賺錢或追求財富的學問，而談到佛教，就想到「青燈古佛」的意象，認為佛教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宗教。因此，佛教與經濟學是可以相通的嗎？

關於這個問題，我分成四個部分來介紹：（一）首先，介紹主流經濟學（mainstream economics）的大要。（二）其次，約略介紹 1960 年代前後的反文化運動思潮及其後所衍生的思想風潮，而佛教經濟學基本上也是在這風潮下所出現的反主流思潮之一。（三）在第三部分則介紹佛教經濟學，並約略比較佛教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之異同。（四）最後，約略介紹佛教經濟學的研究議題中，可與主流經濟學跨接之處，作為對佛教經濟學的研究有興趣者的入門參考。

一、略說主流經濟學

主流經濟學主要有兩個流派：¹一個是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被視為經濟理論的主流（orthodox）；另一個則是凱因斯學派（Keynesian Economics），是 1930 年代

¹ 在經濟思想史中將亞當斯密至十九世紀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之前的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而邊際革命後的經濟理論稱為「新古典經濟學」，但凱因斯在其《一般理論》中將他之前的經濟理論稱為「古典學派」，本文對比凱因斯及其前之經濟理論，故依凱因斯而稱之前之主流經濟理論為「古典學派」。

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Recession）後對古典理論的挑戰，而凱因斯（J.M. Keynes）所著《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一書（下稱《一般理論》）的出版，則被稱為「凱因斯革命」（The Keynesian Revolution）的開端。

約略來說，古典經濟學是指 1776 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出版後所出現的經濟理論。古典經濟理論的出現，主要是因產業革命帶來了市場的擴大，人類社會需要系統性的知識來理解、分析市場經濟活動，也需要知識理解如何藉由市場運作達成資源分配效率等問題。古典理論是建立在幾個基本假設之上：（一）完全競爭的市場，（二）充分就業是經濟常態，（三）經濟活動參與者均是理性的決策者，（四）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五）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以及（六）自利心（self interest）是推動市場活動的「不可見的手」等。

古典經濟學者認為自由市場機制下的理性經濟活動，讓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自利心充分發揮並達成「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便可以達成整體經濟資源配置「最佳化」的結果，而其分析方法，則是以數學模型為輔助，追求「科學化的經濟分析」，並推算達成「最佳化」的市場價格與數量。在「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市場制度中，讓所有市場參與者自由選擇而產生的結果，都是「最佳」的結果；市場均衡是常態，就算出現短暫供需失衡，也可透過自由市場的調節，很快恢復均衡。因此，當自由市場中出現失衡時，政府的政策干預非但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干擾市場自動恢復均衡的主因。

然而 1929—1933 年間的全球經濟大蕭條，工業化國家出現持續性經濟衰退、物價上升，和大量的長期失業等現象。以自

由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主流經濟理論既無法解釋當時的經濟現象，也無法提供有效的政策思維來應對當時的經濟狀況，因此出現了凱因斯革命，挑戰主流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主張。

（一）古典經濟學

1930 年代之前的主流經濟學，特別指的是 19 世紀以來的經濟思潮，其內容主要談自由市場中的生產和分配效率，以及最適化經濟福祉（**optimal economic welfare**）目標如何達成等議題。

市場是如何運作的？古典學者認為每一個市場活動的參與者都是為了追求自己經濟欲望的滿足，這種動機被稱為自利心。整個市場活動的推動，靠的是一隻不可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也就是自利心。換言之，每個人為了自己的經濟利益，到市場去想辦法讓自己的欲望能夠滿足，而在追求個人欲望滿足的同時，也帶來他人欲望滿足實現的機會。也就是說，在市場交易活動中，為了交易而有供給，亦即供給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對他人物品的需求，而該項他人物品是自己無法生產的。因此，從交易的動機來說，供給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但交易完成的結果是彼此都獲得需求的滿足。因此，當每一個市場參與者的最佳化目標達成時，也是每一個消費者達成效用最大化（**utility maximization**）、生產者達成利潤最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之時，同時也是整體經濟體系資源配置最適化（**optimal resource allocation**）和福祉最大化（**welfare maximization**）達成之時。

在這樣的「自利心」發揮過程中，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決策者，而所謂的「理性」是指不論其決定何時交易或如何交易，

都是為了達到自己滿足或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此一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在廠商來說是在市場活動中追求利潤最大化；對消費者而言，則是在市場中追求自己滿足的最大化。這種利益最大化的經濟決策者，被認為是「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

前述供需雙方交易的場域，是一個完全的市場（**perfect market**）。所謂完全的市場，是指市場的供需行為、價格機制等，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達成常態性的供需均衡現象。在此市場中一旦市場出現供需失調，價格會自動作相對應的調整；若出現供給過剩，市場價格便下降，若供給不足則使價格上升。透過靈活價格（**flexible price**）的調節，市場供需會自動恢復均衡（**equilibrium**）。在供需均衡的情況下，市場上沒有買不到或賣不掉的商品，因此便沒有資源被使用在不被需求產品上，也沒有資源被過度使用的狀況。換言之，資源都被使用在恰恰最需要的地方。因此，透過市場機制的自由運作，理性經濟人最大化目標達成的同時，經濟體系也實現了資源最適配置的目標。

古典經濟學對市場運作的思維，其出發點在於觀察到地球資源有限（**limited resources**），而人類欲望無窮（**unlimited wants**）。為了要用有限的資源來滿足無窮的欲望，必須找到一個最有效率的資源方式（**efficient resources relocation**），也就是追求資源配置效率最佳化的目標。

在經濟體系中，不論是出現「供給大於需求」的超額供給（**excess supply**），或是「需求大於供給」的超額需求（**excess supply**）等情況，都是資源配置無效率的現象；在商品出現「超額供給」時，顯示過多的資源用在沒人要的產品之上；在「超額需求」時，則是太少的資源用在很多人需求的物品上，因此

才有供不應求。發生供過於求，市場價格會下降，反之則市場價格出現上升的現象。市場價格是資源配置的風向球，以價格做為資源使用的指引訊號，透過自由市場的價格機制，可以讓資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維持價格隨著供需改變的靈活調整，便可以指引資源用到最適當的地方。當市場供需均衡之時，也是資源用在最適當用途目標的實現之時。此時有限的資源配置結果，可以讓最大多數人的欲望得到滿足，也是社會整體滿足最大化、社會經濟福祉最大化的實現。

在「完全市場」的經濟體制中，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不僅沒必要，反而會干擾市場效率的實現，這是古典對經濟政策的主要看法。在這樣的思維之下，經濟體系只要沒有任何外在的干預，最後每個人都能實現滿足最大化的目標，而且每個人經濟福祉最大化目標的實現，也是整個經濟體系有限資源在各種不同用途間配置效率達到最佳狀態之時。此一看法，反映的是亞當斯密以後的主流經濟學者均是擁護「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思想的經濟自由主義者。

在「自由放任」的經濟體系中，藉由「不可見的手」指引，不需要任何人為的政策干預，只要讓不可見的手充分運作，便可達到經濟福祉最大化的實現，亦即不論個人的經濟福祉，或者社會的整體福祉，都能夠達到最大化的實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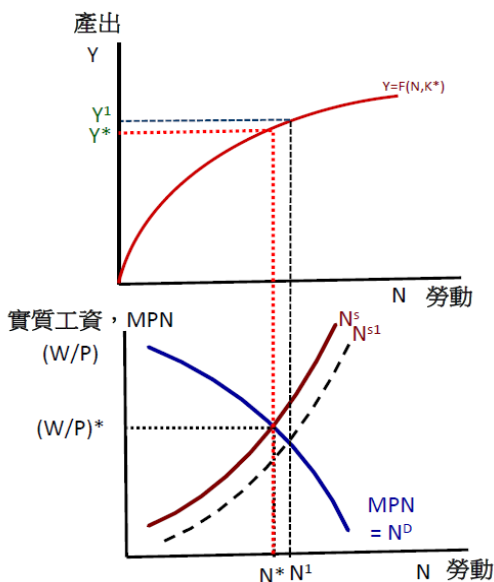
經濟福祉，被視為一個經濟體的幸福程度的指標，而達成滿足的最大化，也是幸福或福祉最大化的實現。然而所得水準的高低，限制了消費能力的水準，以及欲望滿足能力。所得越高，滿足欲望的能力就越大。因此，所得水準或整體經濟體系的 GDP 或 GNP 的高低，也被視為經濟福祉的指標。

在古典經濟理論中，產出和就業是「供給決定的」（*supply determined*），亦即受總體經濟體系中的供給面因素，特別是

受勞動市場中的勞動供給意願所決定。亦即在任一工資水準下，勞動供給意願增加，就業水準隨之增加，產出也跟著增加。

但勞動供給意願是如何決定的？就業水準，是勞動者將有限的時間在「休閒」與「工作」之間配置的結果。若將時間拿來作休閒活動，可以帶來效用，卻無所得；若將時間拿去從事勞動活動，則需犧牲休閒，會產生負效用，然而工作可以賺取所得以支應消費開銷，而消費會帶來效用的增加。因此，就業的多寡，是理性的勞動者將時間在「休閒」與「所得」之間做效率化配置的結果。

在正常情況下，每小時的工資越高，勞動者願意工作的時數也越多。將每一工資下勞動者願意工作的時數的組合點連線，便是勞動供給線；勞動供給線（圖一， N^S 線）顯示工資水準越高，勞動供給的意願就越大的現象。



圖一：古典理論中的總產出和勞動市場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然而從勞動需求來看，工資越高，則勞動雇用成本提高，雇用的意願就越低。圖一的勞動需求線（ N^D ）顯示在不同薪資水準下，生產者願意雇用勞動的數量；此線顯示勞動雇用數量與薪資水準呈反方向變動的關係。薪資水準固然影響廠商的勞動的雇用，但廠商在每一薪資水準下的勞動雇用決策，受已知的生產技術，以及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決策所影響。

一單位資本應配合多少勞動去從事生產，這是生產技術所決定的。在一定的資本存量（ K^* ）下，新增一單位勞動的雇用，雖會帶來總產出增加的效果，但新增雇用的一單位勞動對產出增加的貢獻，會小於前一單位勞動的貢獻，而出現勞動邊際產出遞減（decreasing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的現象。圖一上半部是代表投入與產出效率的生產函數， $Y=F(N, K^*)$ ，隨著橫軸勞動投入量的增加，總產出會跟著增加，但新增勞動投入對產量增加的貢獻逐漸遞減，此一現象如圖一下半部的勞動邊際產出線（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MPN）所示。

新增一單位勞動的雇用，所帶來的成本是其實質工資（ W/P ），但新增勞動雇用帶來的收益增量則是其邊際產出。從生產者利潤的角度來思考，只要新增一單位雇用的利益大於成本（即 $MPN > (W/P)$ ），則可以增加雇用；反之，則減少雇用。生產者勞動雇用的均衡，出現在 $MPN = (W/P)$ 時，此時也是勞動雇用的結果使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實現之時。

生產者勞動雇用的利潤最大化條件，是每一單位新增雇用的邊際產出等於其邊際雇用成本（實質工資）。每一個工資水準對到 MPN 線，會有一個相對應的勞動投入量，此一勞動數量也是此一薪資水準下廠商利潤最大化的勞動需求量。因此，圖一下半部的勞動邊際產出或邊際生產力線即是廠商的勞動需求線（ $MPN=N^D$ ）。由於勞動邊際產出遞減之故，因此勞動

需求線是一條負斜率的線，代表工資越高，勞動需求愈少。

在勞動市場中，已知技術決定勞動邊際產出和勞動的需求，而勞動供給則是家計單位在所得與休閒間作替換選擇的結果。圖一的下半部中，勞動邊際產出（MPN）是已知技術所決定，亦即在現有技術下以固定的資本配合變動的勞動來投入生產，新增勞動的邊際產出多寡受技術所決定的，因此勞動需求是給定的，故而勞動需求線（ N^D ）在技術不變的情況下是固定位置的。

在古典就業市場的分析中，勞動市場唯一會變動位置的是勞動供給線（ N^S ），它是受家計單位休閒與所得的偏好所決定。一旦偏好改變，則這條線的位置就會往左或往右移動，均衡的就業水準和產出水準便隨之改變。如果勞動供給的意願增加，勞動供給線 N^S 右移，新的勞動供給線如 N^{S1} 所示。在此新的勞動供給之下，就業水準增加成 N^1 ，而產出水準也增加為 Y^1 。

在此一分析中，產出和就業都是受勞動供給決策所影響，所以古典理論說「產出和就業是供給決定的」。此外，由於勞動市場的就業是勞動者對休閒和所得的偏好及時間配置達成最佳化的結果，而此一就業數量也顯示在某一薪資水準下，願意工作、而且到勞動市場提供勞動供給的勞動者，都實現了其效用最大化的就業量。因此，在古典理論中，此一就業水準即是充分就業的水準²（ N^* ），而相對此就業水準的產出，便是充分就業的產出（ Y^* ）。

古典學者認為總體經濟體系的就業和產出都是由實質經濟活動的供給所決定，而貨幣非實質變數，在經濟體系中僅扮演流通商品、促進交易的「交易媒介」角色。貨幣政策對利率、

² 亦即在均衡工資水準下，能夠工作且願意工作者，都能找到工作。

產出和就業都沒有絲毫的影響力，因為利率是由可貸資金市場（loanable fund market）的資金供需所決定，不受貨幣供給所左右；儲蓄決定可貸資金市場的資金供給，而投資則決定資金需求，資金供需完全不受貨幣供給所左右。因此貨幣供給僅影響物價，不影響可貸資金市場的利率。此外，在充分就業是常態的情況下，貨幣供給的增加只會帶來流通的貨幣數量增加，更多的貨幣追逐一定的產出，導致物價上漲，帶來通貨膨脹效果，貨幣對實質的產出和就業無絲毫的影響。

在古典理論中，貨幣僅影響價格，不能左右產出。由於貨幣政策無法影響產出與就業，若試圖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產出和就業，僅會帶來通貨膨脹的效果。其次，由於產出和就業是供給面決定的，政府若試圖以財政支出的增加來刺激總支出，不僅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效果，更不會帶來總支出的增加，只會帶來排擠民間投資支出的效果。政府若以舉債來支應財政支出的增加，造成可貸資金市場的資金需求增加，產生利率上升的效果，導致投資資金的成本上升，進而減少投資需求。因此，政府若以舉債來支應財政支出，不僅不會影響產出和就業，只會帶來政府支出取代投資支出的現象，產生百分之百的「排擠效應」；若政府以增發通貨來支應財政支出，也不會影響產出和就業，僅會帶來通貨膨脹的效果。

總結來說，古典主張「經濟政策無效論」，主張透過「不可見的手」和市場機制，可以達到資源配置效率最佳化、經濟福祉最大化的效果。若試圖透過經濟政策來調節總體經濟活動，不僅無法影響產出和就業，反而干擾市場效率，降低經濟福祉。

（二）凱因斯學派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時期，出現了一些現象，挑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理論的內容，包括對主流經濟理論的架構和經濟政策思維的挑戰。此時期古典理論所遭遇的挑戰，包括其主張的：（一）充分就業是常態、（二）不需人為干預的完全市場、（三）靈活調整的市場價格機制可解決經濟失衡問題，以及（四）失業者是自願性失業等四個問題。

1. 充分就業是常態：古典所謂「充分就業」有兩層意思：（一）勞動市場中勞動供需的均衡是常態，就算出現短暫的失衡，也可透過自由市場機制及靈活的工資（flexible wages）的調整而消除失衡現象；（二）由於勞動是生產的重要投入，因此，勞動市場充分就業的維持，可使經濟體系的產出維持在「充分就業產出」（full employment output）的常態水準。由於前述之看法，因此古典認為充分就業是經濟體系的常態，故而不承認景氣波動（business cycles）現象的存在，即或經濟體系的產出短暫地偏離「充分就業產出」水準，但由自由市場機制的運作，會使產出很快地回復到「充分就業產出」的水準。

然而 1929－1933 年間的經濟事實顯示，美國的實質國內生產毛額（real GDP）減少了大約 30%，而工業生產指數（industrial production index）則下跌了 47%，同時在 1933 年美國國內的失業率更高達 25%。³對於長期持續性的實質產出衰退現象，自由市場並無自動調節的功能，使得古典「充分就業是經濟體系常態」的看法，遭受到質疑。

³ 見 Smiley, G., “Great Depression”, Econlib. 網址：
<https://www.econlib.org/library/Enc/GreatDepression.html>。

2. 不需人為干預的完全市場：古典認為經濟體系是一個完全市場，在此市場體系中透過自利心及價格機制的充分運作，可以使市場維持資源配置效率和保持市場供需均衡的實現。因此，人為的政策干預對自由市場不僅是不必要，也是干擾市場效率的因素。

然而在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期間，不僅經濟體系的長期失業現象無法自動消除，價格體系對經濟衰退現象的減緩也無任何作用。1929-1932 年間，美國的失業率增加了 607%，⁴當時美國社會所出現的嚴重失業狀況，就算勞工願意接受較低的工資來工作，也找不到就業機會。直到 1933 年羅斯福新政實施，美國政府花錢雇用失業勞工從事公共建設後，失業問題才得到緩解，而美國經濟也才逐步復甦。因此，古典「不需人為干預的完全市場」看法，被事實打臉。

3. 靈活調整的價格機制：古典經濟學認為當供需失調時，透過價格的調整機制，可以解決經濟失衡問題，可是事實上市場價格機能在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期間是完全失能的。

美國社會當時出現長期失業、嚴重經濟衰退現象，以古典經濟學者的思維來說，在經濟體系失衡時，只要透過價格的自由、靈活調整，失衡會很快自動彌平。然而在 1930 年代景氣衰退期，美國的躉售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雖然下跌了 33% 左右，但仍無法促進生產與雇用的增加來帶動經濟體系恢復均衡。因此，凱因斯批評古典的價格機制，認為近代產業經濟體系的市場並無價格完全靈活調整的特性，而是具有價格僵固（sticky price）的特性。

4. 自願性失業：古典認為家計單位是勞動的提供者，其就

⁴ 見 Jerome Blum, Rondo Cameron, Thomas G. Barnes (1970), *The European world: a history* (2nd ed), p.885.

業與否，以及工作時數多寡的決定，都是每個人在工作與休閒之間所作的理性選擇結果，亦即在休閒的效用與犧牲休閒換取所得的效用間作理性的分配的結果。每人每天可支配的時間都是固定的，同一時間無法同時拿來從事工作與休閒，從而工作時間的多寡是「理性經濟人」在所得與休閒之間替換，所作出的最適選擇。依據古典的思維，失業是自願選擇不工作的現象，也是「最佳化」選擇的結果。因此，所有的失業都是「自願性失業」（voluntary unemployment）。

然而，1930 年代的情況是失業者儘管想要自降工資獲得工作機會，也無人願意雇用。因此，當時的失業者，都是被迫失業，而且是長期找不到工作的「非自願性失業」（involuntary unemployment）。古典理論對失業原因的解釋，也是造成 1930 年代的學者對其理論不信任的原因之一。

凱因斯革命

由於時空環境的轉變，使得古典的市場分析理論無法解釋 19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現象。這個時候凱因斯理論應運而出，針對古典理論的不足，凱因斯提出對總體經濟理論及解決經濟問題的看法，被稱作「凱因斯革命」。

凱因斯《一般理論》一書，是對之前主流經濟理論的批判，他將之前的經濟理論，統稱為「古典經濟學」（Classical Economics）。凱因斯認為古典經濟理論有所不足，批評他們對貨幣、利率、就業等問題所做的解釋，全是建立在特殊假設之上而發展，缺乏普遍性。因此，他提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a general theory），彌補古典理論對經濟問題論述的不足。

凱因斯對古典經濟理論的「革命」，約略可以從四個角度來看：（1）對市場機能提出不同的看法，並說明市場價格機能

為何失效的原因。相較於古典的「完全市場」看法，凱因斯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產業經濟體系的市場是「不完全市場」，因此市場價格具有僵固性，無法隨供需的相對變化而作靈活調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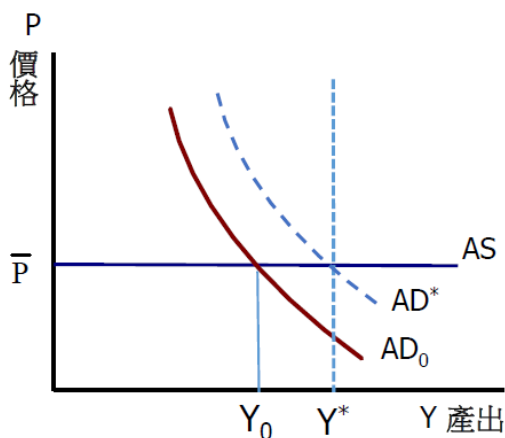
(2) 提出對就業和產出決定因素的看法，認為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中，產出和就業是「需求決定的」，而非古典所稱的由「供給決定」。(3) 對充分就業是常態的批評，認為充分就業僅是經濟體系的一種可能狀態，而非必然而恆常的結果。產出和就業之所以偏離充分就業的水準，主要是受總支出波動影響所致。在蕭條時期持續性出現的產出和就業低迷的現象，基本上是「有效需求不足」(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所導致。

(4) 反駁古典的「經濟政策無效論」，認為不論是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能對經濟活動產生刺激和調節的效果，特別是在景氣蕭條時期，寬鬆的政策能產生提振有效需求的效果。茲就凱因斯革命的內容進一步討論：

(1) 對於市場機制的看法：凱因斯認為近代產業經濟體系的市場不是古典所說的「完全市場」，而是不完全市場(imperfect market)，而且不論是產品市場或勞動市場上，都存在價格或工資僵固性(sticky prices & wages)的狀況。

價格僵固性：在產品市場中，生產者依據其生產成本及預期的利潤，設定產品的價格，此一價格設定後，除非面臨重大的市場供需變動，否則廠商不會輕易調整價格。

廠商以固定的產品價格銷售產品，因此經濟體系的短期總供給線(aggregate supply curve)是對應固定價格($\bar{P}$)的一條水平線(圖二之 AS 線)。廠商在其設定的目標價格下，依據市場的需求情況，決定其產出水準，並雇用勞動投入生產。因此，在凱因斯來說，產出和就業是需求決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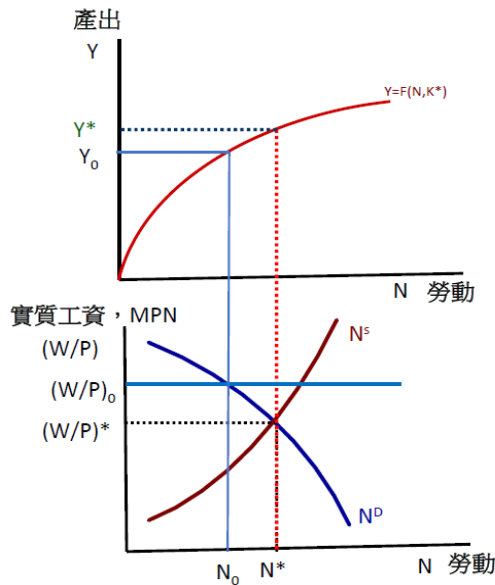
圖二：凱因斯的短期總供給線及產出的決定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此外，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生產者，或多或少都具有寡佔或獨佔性競爭的能力，因此對自家產品都是「價格制訂者」，而非古典所稱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價格接受者」。假設廠商對產品售價訂在 $\bar{P}$ 水準，圖二中水平的 AS 線是固定價格下的短期總供給線。如若市場的總需求為 AD^* ，則在此需求下， AS 與 AD^* 相交處決定產出水準為 Y^* 。依據已知的生產技術及產品的需求（ Y^* ），廠商決定雇用所需的勞動來投入生產。因此，勞動需求是因產品需求而衍生的需求。

倘若在此固定價格 $\bar{P}$ 下，總需求下降至 AD_0 ，其對應的產出水準下降至 Y_0 。產出下降，相對的勞動雇用也減少。總需求由 AD^* 下降至 AD_0 ，產出水準下降，勞動就業也下降。總需求不僅決定總產出，也衍伸出對勞動雇用的需求，這是凱因斯所說「產出和就業是需求決定的」的理由。其次，如果相對於 AD^* 需求水準的產出 Y^* 是充分就業產出，則對應於較低總需求 AD_0

的總產出水準 Y_0 雖然也是均衡的產出（也是 $AD = AS$ 所決定），但 Y_0 低於充分就業的產出水準 Y^* ， $Y_0 < Y^*$ ，因此 Y_0 代表的是景氣衰退期的產出，產出下降的原因是 $AD_0 < AD^*$ 。換言之，需求水準太低，導致失業增加或充分就業無法實現，這是凱因斯對「有效需求不足」⁵導致失業或景氣蕭條的解說。

在勞動市場中，生產者依據勞動邊際生產力及市場產品需求，決定以多少的工資、雇用多少勞動者投入生產。在凱因斯的勞動市場中，生產者依據其產品的需求，決定勞動投入的雇用。圖三中如果勞動市場工資的完全靈活調整機制能夠實現，則能實現充分就業水準 N^* ，以及相對應的「充分就業產出」水準 Y^* ，這是古典論述的狀況。



圖三：凱因斯理論的生產函數和勞動市場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⁵ 「有效需求」是指能使充分就業實現的需求水準。

然而在凱因斯來說，由於有效需求不足，故經濟體系的產出水準為 Y_0 ，相對應於 Y_0 ，生產者利潤最大化的勞動雇用水準為 N_0 ，而對應此一勞動雇用水準，生產者給出的工資是 $(W/P)_0$ 。而在 $(W/P)_0$ 的工資水準，經濟體系願意工作的勞動數量大於勞動供給數量（ $N^S > N^D$ ），因此出現了失業現象。

依據古典的看法，此時如果工資能往下調降至 $(W/P)^*$ ，便可消除失業的現象。然而在凱因斯來說， $(W/P)_0$ 的工資水準，是廠商利潤最大化的勞動雇用水準所決定，除非總需求變動導致衍生的勞動雇用變動，否則就算經濟體系有大量失業，利潤最大化的雇用工資 $(W/P)_0$ 也不會變動，這是凱因斯對勞動市場「工資僵固性」現象的解釋。

凱因斯認為，產品市場與勞動市場都具有「不完全性」⁶，並非古典所稱的「完全市場」；不論是產品市場的產出水準，或是勞動市場的就業量，都是由需求所決定的市場（demand determined）。

（2）關於產出和就業的決定因素：如果產出和就業都是需求所決定的，那決定總支出的因素有哪些？凱因斯認為國內產品的總支出（aggregate expenditure, E ）是由四個部分所構成，分別是：民間消費支出（consumption, C ）、民間投資支出（investment, I ）、政府部門的購買支出（government expenditure, G ），以及國外部門對本國最終財貨和勞務的淨支出，亦即淨出口數額（net exports, NX ）等四部分所構成。因此，總支出的決定式可以表示為：

$$E = C + I + G + NX \quad (1)。$$

由於總支出的多寡決定實現的總產出水準（GDP, Y ），因此 $Y = E$ ，但產出決定生產要素的雇用，衍生出等價的要素所

⁶ 即市場具有壟斷或寡斷的特性，如台灣的電信業市場，是非完全競爭市場。

得，因此進而推導出國民所得等式：

$$Y = C + I + G + NX \quad (2)。$$

在式(2)國民所得(國民產出)的決定式中，消費支出(C)的大小和生活的食衣住行支出有關，其水準是相對穩定的。其次，投資支出(I)則受到資金的借貸成本(利率)和廠商對未來獲利的預期(profit expectation)所左右。在一定的獲利預期下，如果利率(r)升高，則投資資金的需求便下降；在一定的利率水準下，如果廠商對未來獲利的預期變得樂觀，則投資需求及投資支出便越大。然而，投資的預期獲利判斷，受主觀的心理因素及客觀的環境訊息所左右，這些內外因素都是浮動的，因此投資支出是不穩定的，因此凱因斯說投資支出受「野獸精神」(animal spirits)所牽引。由於投資受不穩定的心理所左右，再加上投資支出通常數額龐大，且持續時間很長，因此投資支出的變動是總支出變動的主要因素，也是景氣波動的元兇。其次，政府購買支出(G)通常是政策和預算所決定，若無政策變動，則政府購買支出是相對穩定的。最後，淨出口(NX)則是本國對外國商品的購買(即進口)和外國對本國商品購買(即出口)的淨額。淨出口的大小，與經濟體的開放度有關，也受本國對國外產品的消費偏好度所影響。

瞭解總支出的組成及各項支出的特性，有助於理解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及相應的對策。在前述四項支出項目中，消費支出雖相對穩定，但在景氣衰退時期，消費者信心下降，民眾的消費態度變得趨於保守，使得消費支出下降。在景氣繁榮期，投資支出可能因為樂觀預期而出現爆炸性成長，但在蕭條期，投資者對未來普遍悲觀，投資意願低迷，投資支出更大幅萎縮。由於民間支出的萎縮，使得景氣蕭條的狀況更加延續，難以復甦。能夠讓充分就業的產出實現的需求，稱為「有效需求」，

但在蕭條期的消費與投資支出水準的下降，使得實際產出低於充分就業產出，因此凱因斯認為經濟蕭條是「有效需求不足」所導致。

相較於古典的產出和就業是供給決定的說法，凱因斯認為產出和就業是需求決定的，而有效需求的不足與持續低迷，是經濟體系長期蕭條的原因。此時民間支出不足的狀況，應該由政府購買支出的增加做彌補，以刺激景氣的復甦。相對凱因斯的論點而言，古典經濟學不僅對於持續蕭條與失業現象，無法提供合理解釋，對於經濟政策也無法提供解方。

（3）關於貨幣在經濟體系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影響：在古典理論中，貨幣僅是交易的媒介，不具資產保存的功能。凱因斯則認為貨幣和其他有價證券一樣，都是資產保存的選項，而貨幣的利率和其他資產的報酬率有密切的關連。

大眾的儲蓄可以用現金的方式保有，也可以債券或其他不動產的方式保有。資產在各種理財選項的配置選擇間達到均衡時，貨幣的利率和其他資產的報酬率會趨於一致；一個資產市場的供需達到均衡時，其他市場也同時達到均衡。因此，可以將貨幣市場的利率作為觀察金融市場資產報酬率的指標。

利率的水準，受貨幣市場中的貨幣供給和貨幣需求所決定。經濟體系的貨幣供給，受中央銀行政策決策所影響，不受經濟活動水準所左右。至於貨幣需求，凱因斯認為它受大眾的流動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所決定。⁷人們手中想保有貨幣，受三種流動性偏好動機所左右，分別是：（一）交易動機的貨幣需求、（二）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以及（三）投機動

⁷ 流動性偏好指出，儘管握有貨幣要犧牲利息的收益，但民眾在資產配置時，仍偏好保有貨幣或可以很快變現成貨幣使用的其他資產，這是凱因斯貨幣需求理論的基礎。

機的貨幣需求。

首先，交易動機的貨幣需求（ L_1 ）認為握有貨幣是為了便利日常生活中交易之所需，此一需求是總體經濟體系產出或所得水準（ Y ）的函數， $L_1 = L_1(Y)$ 。其次，預防動機的貨幣需求（ L_2 ）說明握有貨幣是為了支應不預期的花費或交易之所需；此一需求受所得水準（ Y ）及保有貨幣的機會成本（利率， r ）所左右， $L_2 = L_2(Y, r)$ 。最後，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 L_3 ）則是為了進行投機性的資產交易之所需而握有貨幣，因此一動機而保有的貨幣數量，受保有貨幣的機會成本，也就是利率高低所左右， $L_3 = L_3(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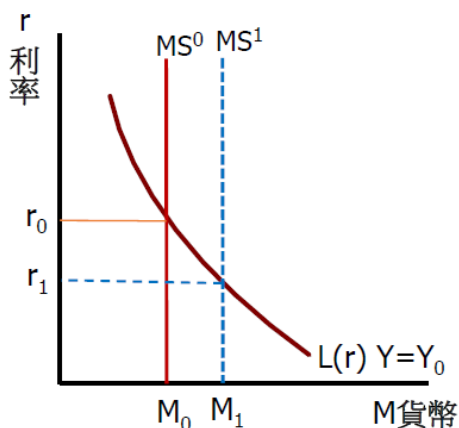
貨幣需求雖是由三個流動性偏好的動機所構成，但總結來說，影響貨幣需求高低的因素，僅有兩個因素，亦即所得（ Y ）和利率（ r ）兩項。因此，貨幣需求函示可以表示為：

$$L = L_1 + L_2 + L_3 = L(Y, r) \quad (3)$$

在（3）式中，貨幣需求是所得（ Y ）的增函數；所得提高，貨幣需求增加。此外，貨幣需求是利率水準（ r ）的反函數；利率提高，貨幣需求下降。圖四中，在一定的所得水準之下（ $Y = Y_0$ ），貨幣需求與利率呈反方向變動的關係，亦即貨幣需求線是一條負斜率的線，反映前述利率變化與貨幣需求變化的關係，如圖四中 $L(r)$ 所示。

在一個經濟體中，貨幣供給數量係由中央銀行的政策所決定。如果貨幣供給量為 M_0 ，則相對應的貨幣供給線是圖四中的垂直線（ MS^0 ）所示。在貨幣市場中，貨幣需求與貨幣供給決定了均衡的利率水準（圖四， r_0 ）。如果中央銀行決定施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將貨幣供給量由 M_0 增加至 M_1 ，則貨幣供給線會右移至 MS^1 ，新的貨幣供給線與貨幣需求線相交處決定了新的均衡利率，貨幣市場的均衡利率由 r_0 下降至 r_1 。利率下降會

帶來投資成本下降的效果，因此影響投資支出的意願及總支出，進而影響經濟活動水準。簡言之，貨幣政策的變動會影響均衡利率，而利率變動則會影響投資資金的借貸成本，進而影響投資需求與總支出。總支出水準決定總產出，進而影響勞動的雇用和就業水準。



圖四：凱因斯的貨幣市場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4）反駁古典學者的「經濟政策無效論」：在古典理論中，產出和就業是供給面因素決定的，也是市場參與者利益最大化追求所產生的最佳化的結果，因此不論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無法影響產出和就業。但在凱因斯的總需求分析或貨幣分析中，不論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會影響產出和就業。

在《一般理論》中，凱因斯認為貨幣除了基本的交易媒介功能之外，還有資產保值選項的功能，因為保有貨幣即握有對其他有價值物品的購買力或支配力。貨幣市場的貨幣供需影響均衡利率，而貨幣市場的利率則影響到實質經濟活動的投資支出。由於投資是總支出中的重大項目，因此投資變化影響總支

出。在凱因斯的分析中，產出和就業是總需求（或總支出）所決定，亦即總需求高低決定總產出。換言之，貨幣政策的變動影響利率，透過利率影響總需求，進而影響產出和就業。

此外，一個經濟體為什麼會出現失業？凱因斯認為是因為需求不足。大眾缺乏花錢的意願，購買支出低迷，生產者便缺乏生產的意願；生產意願低落，勞動需求便相對減少，勞動者也就沒有就業機會了。因此，凱因斯說持續性失業的現象是需求不足所產生的問題，也就是使充分就業實現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依據其產出和就業是總需求決定的論述，若欲解決景氣低迷時期的失業問題，可以藉由政府支出增加為手段，以之彌補民間支出意願下降所產生的總需求不足問題。

總結來說，凱因斯認為政府應該用經濟政策來促進經濟活動水準，也可以用經濟政策達成影響經濟活動的目的。自 193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後，凱因斯把經濟政策帶回到經濟理論中來，而自 1970 年代開始，古典與凱因斯學派的學者便不斷出現經濟政策的論辯，包括經濟政策「該不該用？何時用？使用結果有效或無效？」等問題，依據各自理論提出分析論述。

（三）主流經濟理論中的「幸福」

主流經濟理論⁸雖未直接對「幸福」一詞做出定義，但「經濟福祉」（economic wellbeing）在其分析中儼然就是「幸福」（happiness）的代名詞，而其所謂「經濟福祉」的高低則是以所獲得的物質欲望滿足高低做衡量。

其分析以「自利心」做出發點，認為每個人到市場中進行

⁸ 此處主流經濟理論，是指古典和凱因斯理論，而對於經濟福祉的分析，特別是指十九世紀邊際革命後經濟分析中的觀念與方法。

交易的目的是為了追求物質欲望滿足的機會。在市場中「成功的交易」不僅可以獲得生存所需的物資，也能夠得到物資或財富積累的安全感；在市場活動的社會關係中，更能得到成就感，以及社會角色或地位認同的滿足感。因此，任何成功的市場交易活動，對參與者來說，不僅得到物質欲望的滿足機會，也能夠帶來心理上的滿足。

市場的發展，不僅帶來物質需求關係的社會化，也帶來生產關係的社會化。市場交易制度高度發展，帶來「專業分工」的生產方式，從經濟目的而言，此一生產方式不僅提升了生產效率，產量提高，進而使市場交易能夠擴大。然而在「專業分工」為常態的市場經濟體系中，每個人都無法生產自己日常所需的一切物資，必須靠他人所生產的物品才能滿足生活需要。從個人角度而言，市場交易的目的固然是為了獲得生存所需物資，但物質性的消費卻可以帶來心理的滿足。這種物質欲望滿足的感覺，在經濟學上被稱做「效用」（*utility*）。在主流經濟分析，著眼於「理性經濟人」的自利心如何在市場活動中充分發揮，以追求「效用最大化」或「滿足最大化」目標的達成。

交易完成之時，交易雙方均達成其滿足最大化的目標；當市場達到均衡時，不僅是個別的市場參與者經濟福祉最大化達成之時，同時也是有限資源「最適配置」（*optimal allocation*）的實現或市場「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達標之時，更是整體經濟體系福祉最大化的實現。因此，此一效用分析，不僅被用在個人效用最大化問題的探討上，也被應用在整個社會的「社會福祉」（*social welfare*）最大化的分析中。

茲以消費者的消費選擇，說明主流經濟學「欲望滿足最大化」的經濟分析。在「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假設作為前提之下，消費者滿足最大化的分析，有兩個主要的思考：其一，

應如何顯示或衡量消費者的滿足程度？其次，消費者是否能夠毫無限制地追求欲望滿足？對於這兩個問題，主流經濟學對應「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假設，以「消費者無異曲線」(consumer indifference curve)和「預算限制」(budget constraint)來分析。

1. 消費者滿足程度的衡量：消費者無異曲線分析

消費者無異曲線分析以消費者偏好 (consumer preference) 為基礎而開展，假設每一個消費者對所有的消費品（或消費品組合）都有確定的主觀偏好。消費者依據自己主觀的意願，對可供消費的個別品項或消費品組合進行偏好排序，此種排序反映消費者個人對物品的需要性高低、興趣和嗜好。

假設其他情況不變（即所得、價格、偏好等因素不變），消費者對某一消費品的需求量和該商品的偏好程度呈正相關關係，亦即偏好程度越高，則對該消費品的需求數量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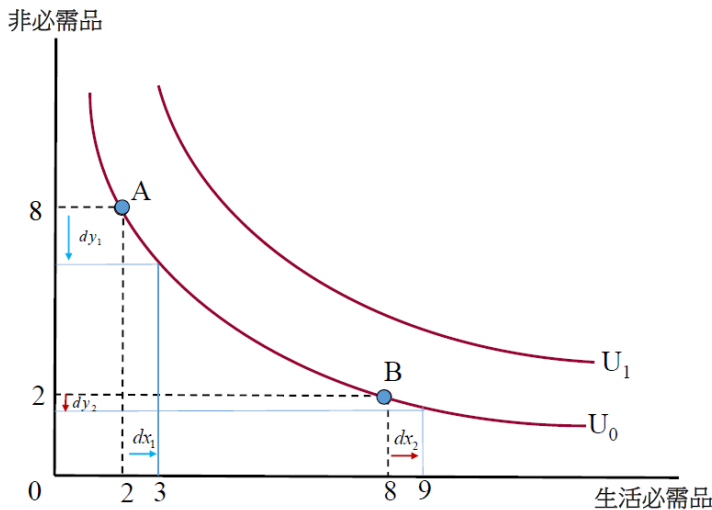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消費者對一項物品的消費數量愈多，所得到的滿足感就越高；然而隨著消費數量的增加，新增一單位物品消費所帶給消費者的滿足，會較消費前一單位所得到的滿足來得低，進而出現「邊際效用遞減」(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的現象。例如：大熱天喝一杯冰紅茶的感覺很棒，但繼續喝第二杯得到的舒服感就不如第一杯的透心涼，這便是消費的「邊際效用遞減」現象。

茲以生貨幣需品及非必需品為例來說，消費者對個別生活必需品或非必需品的消費都會帶來效用，但對兩種物品的組合消費也會帶來效用。由於兩類物品均可產生效用，因此消費者一般都會將兩類物品組合而進行消費。換言之，消費者可以採取「多消費生活必需品，少消費非必需品」的消費組合，也可

以採用「消費少量的生活必需品，但消費較多量非必需品」的組合。對不同物品的消費組合，雖然會帶來高低不等的滿足程度，但也有一些不同的消費組合會帶來同等程度的滿足。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消費者在必需品和非必需品（ x 、 y ）兩種財貨間作消費組合的配置。在 XY 的座標平面上，將能夠維持同等效用水準的組合點連線，其連線的軌跡即是「消費者無異曲線」（簡稱無異曲線，**indifference curve**）。圖五的 U_0 線即是無異曲線，此線上任一點的消費組合所帶來的效用水準皆相同。

圖五 U_0 線上的 A、B 兩點代表不同的消費組合，A 點的組合必需品僅消費 2 個單位，但非必需品則消費 8 個單位；在 B 點的組合中，必需品的消費有 8 個單位，但對非必需品則僅消費 2 個單位。儘管這兩個組合對兩類物品的消費數量不一樣，但它們都對消費者帶來同等的滿足水準 U_0 。



圖五：消費者無異曲線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消費者增加或減少一單位物品的消費所產生的效用水準變量，稱為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 MU**）。從 A 點到 B 點的消費組合改變，消費者減少了非必需品（ y ）的消費，增加了必需品（ x ）的消費，但仍然維持同樣的滿足水準。換言之，增加必需品的消費（ Δx ）所帶來效用的增量（ $MU_x \cdot \Delta x$ ），與放棄必需品的消費（ Δy ）所產生的效用減量（ $-MU_y \cdot \Delta y$ ）相等，亦即

$$MU_x \cdot \Delta x = -MU_y \cdot \Delta y \quad (4)$$

在（4）式中， MU_x 是改變一單位生活必需品（ x ）消費所帶來的效用改變； MU_y 是代表變動一單位非必需品（ y ）消費的邊際效用； Δx 、 Δy 則代表兩種物品消費數量的改變。由（4）式，由（4）式可以導出： $-\Delta y / \Delta x = MU_x / MU_y$ （5）

在（5）式中， $-\Delta y / \Delta x$ 是邊際替代率（**marginal rate of substitution**），代表為了維持相同的效用水準，每增加消費一單位 x 的消費，所必須放棄消費 y 數量的比率； MU_x / MU_y 則代表新增一單位 x 與放棄一單位 y 的邊際效用比例。換言之，若變動消費組合而維持總效用水準不變，邊際替換率與邊際效用比例應維持（5）式的關係。

圖五中的無異曲線是負斜率的線，其意義是若欲維持效用水準不變，新增一單位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則要放棄若干非必需品的消費才能維持總效用水準不變，所需放棄的比率即為邊際替換率。此外，無異曲線的形狀是凸向原點（**convex to the origin**）的一條線，其顯示的意義是「邊際替換率遞減」的現象，亦即隨著橫軸生活必需品消費量的增加，如果還要繼續增加一單位必需品的消費，則需放棄的非必需品數量會減少，以維持效用水準不變。

圖五來看，消費者若想要新增一單位的必需品消費，在必需品消費數量低和數量高時所需放棄的非必需品數量不一樣。在擁有消費品數量低時（如圖五中之 2 單位增至 3 單位）和消費數量高時（如從 8 單位增至 9 單位），雖均增加一單位消費，但在 8→9 所需放棄的非必需品數量較 2→3 時來得少。從圖五 A、B 兩點的組合來看，消費者同樣想增加一單位的必需品消費（ $dx_1 = dx_2 = 1$ ），並且維持消費效用水準不變，則其所需放棄的非必需品數量在 B 點的組合大過於 A 點的組合（ $dy_1 > dy_2$ ）。此一邊際替換率遞減的現象，主要是受邊際效用遞減法則影響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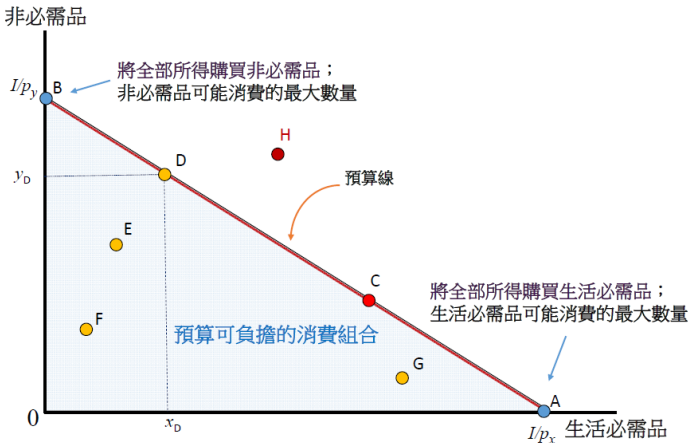
最後，在同一座標平面上，消費者無異曲線的位置越高，其所代表的滿足程度也越大。因此，圖五中 U_1 的無異曲線所代表的滿足水準高於 U_0 者。理性的消費者會在有限的所得之下，追求最高的滿足。

2. 消費者滿足能力的限制：預算限制線

消費者滿足能力的限制，是其所得的高低。消費者將有限的所得（ I ）用在不同的消費用品上，其欲望滿足能力受所得及物價高低所影響。假設消費者將有限的所得在生活必需品（ x ）和非必需品（ y ）間做消費分配，這兩類物品的價格分別是 p_x 和 p_y 。不管消費者如何將其所得在這兩種物品間做消費分配，花費在這兩種物品的總額不得高過於其所得的總額，即 $P_x \cdot x + P_y \cdot y = I$ ，此式即為消費者的預算限制。

圖六說明消費者的預算限制，及預算限制線（budget constraint line）的推導。消費者可以將全部所得拿去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完全不用在非必需品的消費，其所能購買必需品的數量為 I/P_x ，如圖中橫軸 A 點所示。消費者也可以將全部所得

拿去購買非必需品，而完全不用在生活必需品上，其所能購買的非必需品數量為 I/P_y ，如圖中橫軸 B 點所示。當然，消費者也可將所得用光，同時消費這兩種物品，如 C、D 兩點所示。在 D 點的組合中，消費者對必需品消費了 x_D 的數量，對非必需品則消費了 y_D 的數量。這兩種物品的消費組合為 (x_D, y_D) ，此一消費組合將消費者的所得全部花光。因此，消費者的預算限制線以數學式子表示為： $P_x \cdot x + P_y \cdot y = I$ (6)



圖六：消費者的預算限制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將圖中的 A、B 兩點連成一直線，即得消費者預算限制線，此線上的每一個點的組合都滿足 (6) 式的條件。因此，預算限制線是在給定的所得水準 (I) 和已知的財貨價格 (P_x, P_y) 等條件下，消費者將全部所得用盡，購買 x 財貨和 y 財貨的各種可能組合的組合點連線。

圖六中的預算線是一條負斜率的線，表示在一定的所得限制下，如果要增加一種物品的消費，一定要放棄另外一種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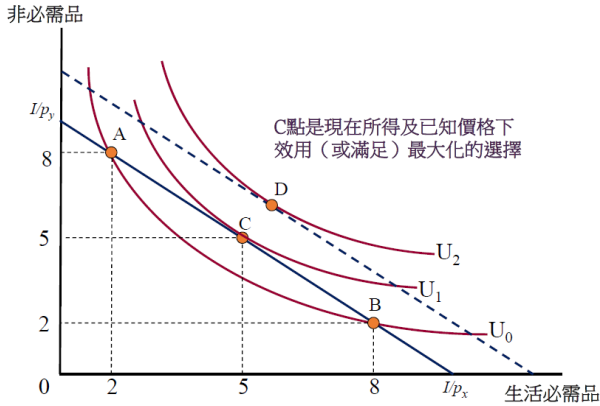
的消費。然而，為了要增加一單位的必需品消費，需要放棄多少非必需品？在維持支出總額等於所得的情況下，新增 x 消費所增加的支出，必須等於放棄 y 的消費所減少的支出：

$P_x \cdot \Delta x = -P_y \cdot \Delta y$ 。因此，兩物品間的替換率，取決於其相對的價格比率： $\Delta y / \Delta x = -P_x / P_y$ ，亦即在替換達到均衡時，兩種物品的替換比率（ $\Delta y / \Delta x$ ）等於兩種物品的價格比（ $-P_x / P_y$ ）。

預算限制線將圖六的座標平面分割成兩個部分：AB 線左下方的三角形區域及右上方的區域。此預算線左下方三角形面積內的點（如 E、F、G），分別代表三種不同的消費組合，這些組合是預算能力可以支應的，但它們沒有把所得用盡，都不是理性消費者最佳的消費組合選項，因為消費者的所得（或手中資源）仍然還有閒置未用的部分。預算線上的點（A、B、C、D）則是將全部所得用盡的可能組合，而預算線右上方 H 點所代表的消費組合則是目前所得水準下不可行的消費組合。換言之，預算線右上方區域的任何消費組合都是「想得到，買不起」的夢幻組合，而 AB 線上及其左下方區域內的組合，都是消費者負擔得起的消費組合，但只有預算線上的組合才是理性消費者最適選擇（optimal choice）的可能組合。

3. 幸福：理性選擇與最大滿足的達成

在預算限制下，消費者如何達到最大化的滿足？這要將無異曲線和預算線結合來分析。在圖七中，預算線上 A、B、C 三個點所代表的消費組合，都是消費者有能力達到滿足，而且將所得花光的消費組合。但把所得用光去作消費，是否必然達到滿足最大化？答案是「不一定」。



圖七：理性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選擇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雖然 A、B、C 三點的消費組合都將消費者的所得用盡，但 A、B 兩點同時位在效用水準比較低的無異曲線 U_0 上，而 C 點則位在效用水準較高的無異曲線 U_1 上。因此，雖然 A、B、C 三點都是將所得全部用盡的可能消費組合，但 C 點組合所得到的滿足要比 A 或 B 所代表的效用高。至於 D 點的消費組合雖然位在效用更高的無異曲線 U_2 上，但這個點所代表的消費組合是消費者目前所得能力無法支應的。因此，理性消費者滿足最大化的消費決策是選擇 C 點所代表的組合，因為 C 點的效用水準是消費者在目前預算限制下所能達到最大滿足的組合。

從前述主流理論的經濟福祉分析中，我們可以瞭解主流的分析是建立在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上，並且在完全自由的市場中讓參與者的「自利心」充分發揮，透過市場機制，解決「資源有限、欲望無窮」的資源配置問題。讓每位市場參與者依據自利心作理性的經濟選擇，並且在限制條件下達到個人滿足最大化的目標；如果每個人都是如此思維、如此選擇，最後結果

就是群體滿足最大化的實現。

因此，主流經濟思潮認為個人經濟選擇的自由、市場交易的自由、市場訊息的完全流通等都是保障市場效率實現的基本因素。他們認為在自由放任的市場中，有限的資源藉由市場機制的運作，可以得出最有效率的配置，而讓最大多數的人獲得最大欲望滿足的機會。此一結果不僅讓每個人的物質幸福（**material wellbeing**）達到最大化，也讓社會福祉達到最大化。

從圖七可以理解到「可用的所得」限制了人們追求欲望滿足提升的機會。在圖七的分析中， U_1 的滿足水準比 U_0 高，但在目前的所得限制之下，能夠達到 U_1 水準的滿足已是理性選擇的最佳結果。但人的欲望無窮，如果想要追求更高的經濟福祉，例如 U_2 的水準，有無可能？在前述分析中隱含的答案已非常清楚：只要設法提高所得，使預算線往右上方移動，如圖七與 D 點相切的虛線，就可以從比較低的滿足程度（ U_1 ）往更高的滿足程度（ U_2 ）移動。因此，從產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便積極追求經濟成長（**economic growth**）以追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滿足，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論是低度開發國家或是已開發國家，莫不追求經濟成長，並以國民所得或 GDP 的增加作為經濟福祉比較的指標。

主流經濟理論在人類思想的發展中佔有一席之地，自有其存在的價值，而且它們對於幫助人們瞭解經濟現象也有其貢獻。從其優點來說，這些理論對人類社會的經濟現象提供了邏輯嚴謹的分析，也說明了自由市場能實現經濟福祉和提升經濟效率的見解。然而，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的一個學門，其分析的對象是人在時空環境活動的社會現象，過度簡化的邏輯推論，也使邏輯完美的理論無法為複雜的人類社會現象做出理論與現況吻合的分析，同時對長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如貧

富不均、生態環境惡化、永續發展等問題，尚無法提供足以服人的解方，這是主流經濟的市場分析所面對的挑戰。

主流經濟分析為了將複雜的經濟現象作邏輯嚴密的推論，並對現象做嚴謹的因果分析，化繁為簡，以「其他情況不變」的假設為基礎而開展推論。在分析方法上，以簡化的模型進行關鍵變數的因果關係推導，其優點為能夠掌握關鍵變數間的關係來進行科學化的數量分析。在這樣的簡化抽象思維框架下的分析，社會環境的問題，如所得分配不均、經濟活動所帶來的污染和自然環境惡化等問題，都被視為是「市場失靈」的問題，認為應該回歸到市場去解決。然而，如果市場運作有效，為何又有前述的問題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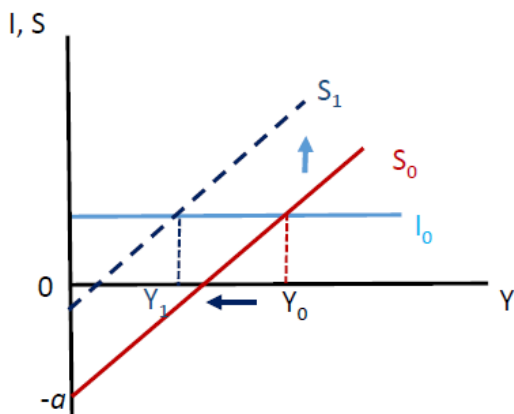
此外，古典經濟學的發展是和產業革命後市場的發展密切相關的。傳統經濟學以物質欲望滿足作為經濟福祉高低的衡量準據，這種建立在物質欲望滿足上的「福祉」思想，不知不覺影響人們的生活態度，間接鼓勵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藉由追求大量消費來提升生活水平，藉以提高福祉，這也是十九世紀以來「消費主義」（consumerism）發展的背景理論。在消費主義的社會中，消費不僅是為了滿足生活的物質欲望，同時也成為社會地位或成功的一種表徵（如炫耀性消費現象即是）。此外，消費主義社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浪費的現象也是今日人類社會所面臨的資源枯竭、環境惡化等現象的重要推波助瀾因素之一。這些問題，都亟待新的思維來探討與解決。

（四）提升長期經濟福祉的手段：凱因斯學派的看法

凱因斯學派雖然對於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以及經濟政策看法與古典經濟學者迥異，但在提高所得以提升生活福祉的看法，凱因斯學派與古典學派並無太大歧異。長期經濟成長固然

需要技術進步來帶動，但在短、中期間，也可以藉由需求政策來刺激所得成長。因為產出和就業是需求決定的，所以若能有效調節或刺激總需求，便可以帶來產出和就業增加的效果，並出現所得增長。藉由貨幣或財政政策來調節總支出固然是《一般理論》的重點，但改變民間保守的消費態度也是另一個重點，因此有「節儉的矛盾性」（the paradox of thrift）看法的提出。

從西方的經濟史來看，產業革命之後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出現所得水準提升的現象，但獲得經濟好處者大抵是當時的貴族和資本家。在 1930 年代之前佔社會群眾大多數的勞工階級，仍然僅能獲得生存工資（subsistence wage）水準，處於堪足溫飽的狀態，再加上再加上大蕭條的衝擊，社會上多數人的思維仍然習慣以儲蓄作為保障生活安定的手段。然而凱因斯在《一般理論》中，卻提出「節儉的矛盾性」看法，認為若因節儉而作儲蓄，則整體社會的儲蓄越多，結果卻反使總所得水準下降。因此，過度節儉的儲蓄行為會使所得減少，反而不利生活的穩定，茲於下圖中進一步說明。



圖八：節儉的矛盾性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八中，橫軸為所得（ Y ），縱軸為儲蓄（ S ）與投資（ I ）。一般而言，民眾會將所賺取所得中的某一個百分比儲蓄下來，以供不時之需。凱因斯認為儲蓄不受利率左右，而是所得的函數，因為儲蓄能力受所得左右，所得越高則儲蓄能力越高。因此，儲蓄可表示為： $S = -a + s \cdot Y, 0 < s < 1$ ，左式中小寫 s 是邊際儲蓄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MPS），表示新增所得中被拿來儲蓄的百分比。圖八中儲蓄線 S_0 是一條截距為負的正斜率線；正的斜率表示儲蓄的變量與所得的變化呈現同方向變動的關係，而負的截距（ $-a$ ）表示即使沒有所得，仍然需要基本的維生開銷，此時便出現負儲蓄的狀況。

儲蓄為家計單位的所得被保存而不花用的部分，是所得循環週流的漏損（leakage）；投資是廠商在資金市場中借用家計單位的儲蓄轉做投資的支出，是所得週流的挹注（injection）。當全部的儲蓄被廠商借用作為投資的資金時，漏損等於挹注，亦即儲蓄等於投資時（ $S = I$ ），此時總體經濟體系達到均衡。因此，在圖八中當儲蓄為 S_0 而投資為 I_0 時，儲蓄和投資兩條線相交處，其對應的經濟體系均衡所得水準為 Y_0 。

假設現在民眾對支出趨於保守，以致每一塊錢所得中被拿來儲蓄的數額增加了，此一變化使儲蓄線從 S_0 往左上方移動到 S_1 ，但投資的資金需求仍為 I_0 ，當所得週流的漏損等於挹注時（ $S_1 = I_0$ ），均衡所得變成 Y_1 。因此，增加儲蓄的結果使得均衡所得下降，所得從 Y_0 往左移動到 Y_1 ，而 $Y_1 < Y_0$ 。

一般人的想法是儲蓄越多，財富就越大，但凱因斯說儲蓄的增加導致總所得減少，從而降低了未來的儲蓄能力，因此儲蓄越多反使社會財富縮水。換言之，原本希望多存點錢來增加財富，但大家都增加儲蓄的結果，卻使得未來的所得下降，以致未來儲蓄能力降低，導致財富增加的能力減少。因此，節儉

雖是美德，但當大家變得更節儉，結果反而不利整體經濟體系的產出和儲蓄，這是凱因斯「節儉的矛盾性」所要表達的看法。

凱因斯理論中鼓勵支出，認為過度節儉會帶來所得萎縮的效果，然而當大眾敢花錢時，則會帶來所得「倍數擴張」的效果，這是凱因斯的「支出乘數效應」。

凱因斯將總支出分成兩類：其一為不隨景氣或所得變動而變動的支出，稱為「自發性的支出」(autonomous expenditure)，另一種則是隨所得或經濟情況改變而改變的支出，被稱作「誘發性的支出」(induced expenditure)。凱因斯的支出乘數效果大小的分析，係就自發性支出而說。

自發性支出有三類，第一類是家計單位消費支出項目中的基本生活支出，此類支出是不論所得多寡，都必須要有的支出，其數額是相對穩定的；第二類則是廠商投資支出中不受當期的經濟變數所左右，而受主觀的預期心理或獲利預期心理所決定的部分，此部分的投資數額不受利率變動而影響；最後，第三類則是政府的購買支出，此類支出受預算編列所決定，不隨當前產出的波動而變動。這三類的支出，都是不隨經濟情況變動而變動的「自發性支出」。

為了說明支出的乘數效果 (the multiplier effect)，先介紹凱因斯的消費函數： $C = a + bY$, $0 < b < 1$ 。凱因斯認為消費支出 (C) 由兩部分構成：(一) 維持基本生活的支出 (a)，此部分不受所得變動影響；(二) 隨所得變動而改變的部分 (bY)，此部分的支出會隨所得增加而增加，但人們一般僅會將新增的所得的一小部分拿來消費 ($0 < b < 1$)，並將其餘部分以儲蓄的方式保存下來以備不時之需。在消費函數中，b 被稱作邊際消費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亦即新增一塊錢所得被拿來用在消費的比率。

在一個沒有國際貿易的封閉經濟體系中，總支出（ E ）是由消費支出（ C ）、投資支出（ I_0 ）及政府支出（ G_0 ）所構成： $E = C + I_0 + G_0$ 。此處為了說明簡單的乘數效果，未介紹貨幣與利率，因此視投資為自發性投資，不受利率影響。在凱因斯的分析中，總支出（ E ）決定總產出（總所得， Y ），因此：

$$Y = E = (a + bY) + I_0 + G_0 \quad (7)$$

將（7）式等號兩邊的 Y 移項簡化，得出均衡所得的決定式：

$$Y = \frac{1}{1-b}(a + I_0 + G_0) \quad (8)$$

式（8）中等號右邊有兩個項目： $1/(1-b)$ 及 $(a + I_0 + G_0)$ 。由於 $0 < b < 1$ ，因此 $(1/(1-b)) > 1$ 。換句話說，自發性支出中的三個項目（ a, I_0, G_0 ），其任一項目每增加 \$1 的支出，會使均衡所得以大於一的倍數增加，這便是「乘數效果」。凱因斯用「乘數效果」來說明大家越敢花錢，則整體經濟所獲得的所得倍數增加就越大，這可以從邊際消費傾向（ b ）及自發性支出的改變來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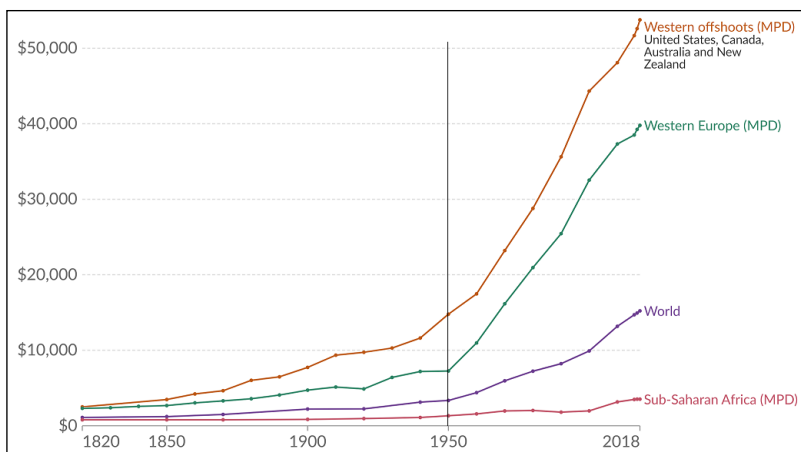
邊際消費傾向是介於 0 和 1 之間的一個數值，如果民眾越敢將新增的所得拿來消費（例如 $b = 0.9$ ），則其所產生的所得乘數效應要比不敢用錢的態度（例如 $b = 0.1$ ）時為大。其次，在一定的邊際消費傾向（ b ）之下，消費者越敢在基本生活上花錢（基本生活開銷的 a 變大）或廠商對未來有更多的樂觀預期而增加投資（自發性投資 I_0 增加），則所得也會呈倍數增長。在經濟蕭條期，民間不敢作消費，廠商也不敢進行新投資（ a 與 I_0 不變），此時政府採用財政支出（ G_0 ）的增加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一樣可以帶來所得倍數增長的效果。

不管是「節儉的矛盾性」或「乘數效果」，凱因斯的理論隱隱約約傳達了一個想法：一個社會越節儉，則經濟越萎縮；

越是敢花錢，則經濟活動水準便越蓬勃發展。因此，有些人把它解讀為「花得越多，就賺得越多」(the more you spent, the more you earn)。

或許並非每個人都同意「錢花越多就賺越多」，但不可否認的是，古典經濟理論中隱含的「提高所得為追求經濟幸福的手段」，以及凱因斯理論的「支出是所得成長的決定性因素」等看法，對十九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生活與經濟政策均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五）對近代資本主義的社經問題與省思



圖九：全球及主要地區之平均每人 GDP，1820-2018

資料來源：Our World in Data;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20 (Bolt and van Zanden, 2020)

主流經濟學的市場分析已如前述，其對於整體經濟體系的富裕或所得提高為目標的追求，對人類物質文明的發展，有其貢獻，而其分析方法，亦有嚴謹的學術依據與價值。然而產業

革命已經過去了將近 250 年，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富裕程度或經濟成長也出現史無前例的提高，特別是自 1950 年代以後，全球平均每人所得（per capita GDP）成長的幅度較前此之一百年為高（圖九），特別是歐美的工業化國家（Western Europe & Western offshoots）經濟成長更是令人矚目。

雖然全球在 1950 年後享受了高所得成長的果實，然而撒哈拉沙漠邊緣的非洲地區（Sub-Sahara Africa）經濟成長仍相當有限。因此，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主流的人類社會，長期追求經濟成長的結果，帶來了全球所得區域間分配不均現象，即或在高度成長的工業化國家內也出現了所得分配不均的社會問題，這是不斷追求所得提高的傳統經濟思維所未能預見的問題。

除了所得分配不均的問題，1960 年代美國和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社會因為所得提高，開始出現大量消費的「消費主義」（consumerism）現象。此一現象雖是所得提高所帶來的效果，然而長期流傳在西方社會的經濟思維對此現象也有推波助瀾效果。

一般人大抵不會排斥從傳統經濟理論衍申的「提高所得可以改善經濟生活與經濟福祉」的看法；而凱因斯理論在 1940—50 年是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主流，其「節儉的矛盾性」或「乘數效果」的思維，則被人解讀成「只要敢花錢、多花錢，整個經濟體系就會更蓬勃發展」。然而所得愈高就愈幸福嗎？敢花錢經濟體系才會更蓬勃發展嗎？

事實上以前述經濟理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體，從 1970 年代開始，出現了幾個值得關切的現象：（一）所得分配不平均現象，包括國內和國際間的所得分配不均；（二）經濟不穩定，即經濟體系在繁榮之後屢屢出現的蕭條現象；（三）廠商獨佔的問題，即某些廠商以其市場獨占力，左右或扭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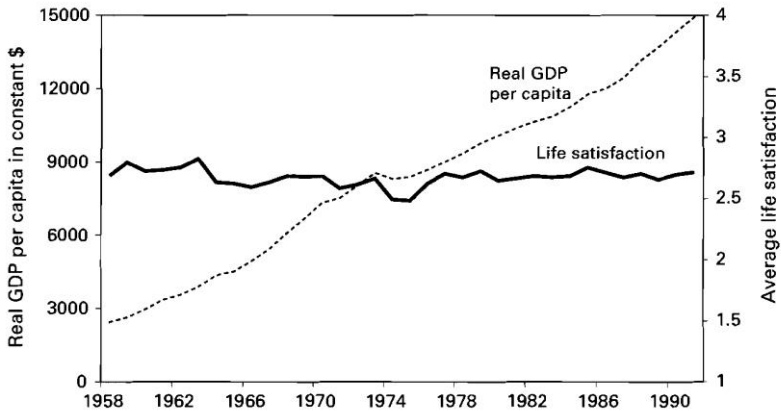
市場的運作，影響到整體經濟福祉；（四）近利短視問題，只顧眼前的經濟利潤與利益，其餘社會問題留給別人或後人去煩惱；（五）地球的資源有限，但長期追求經濟成長帶來環境成本的增加問題，亦即生產者僅關心自己的利潤，一味地追求利潤，不考慮其行為所產生的社會衝擊和環境成本，包括汙染、空污和酸雨等問題；（六）社會流動性問題，由於所得分配不平均或教育機會不均等社會因素，造成社會垂直流動無法實現，出現窮者愈窮的現象。（七）社會資源的水平流動問題，由於許多現實的人為因素或者自然因素的限制，導致資源或商品無法在不同的經濟社會中流通。（八）還有一個更嚴肅的問題，即是經濟成長與生態環境成本（**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st**）的問題。資本主義社會的大量生產、大量消費，產生大量浪費的現象，包括資源過度開採、產品消費產生的垃圾，以及環境污染與惡化等現象，衍生了經濟發展可持續與否的問題。

前述都是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發展下所產生的一些社經及環境生態問題，人類社會面對自己長期一味追求經濟成長所產生的問題該如何解決？這些資本主義市場所衍生的現象，為何難以解決？到底是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或是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均值得深思。

所得提高必然提升幸福？

傳統經濟學追求所得的提高作為提升經濟福祉或幸福的手段，但所得不斷提高真能無盡地提升幸福感嗎？**Easterlin**（1974）提出了一個實證研究的結論，認為幸福感不會和所得的提高呈現同方向變動，此一見解被稱為伊斯特林悖論

（Easterlin paradox）。⁹Easterlin 指出，在特定的時間點，不論是跨國間或是在一國之內，幸福感與所得呈正相關關係，這是因為富有者有較高的所得能力，能享受更高的物質生活之故，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幸福感和所得的長期增長並無顯著的正向相關關係。



圖十：日本國民生活滿意度與每人實質 GDP，1958-1991

資料來源：Figure 3.1. in Frey, Burno S. (2008). *Happines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MIT Press, p. 39.

伊斯特林悖論提出後，後續有許多心理學或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探討經濟成長（或所得提高）和主觀幸福感的關係，¹⁰ 然而對兩者間是否有必然的正向關係並無一致的結論。Burno

⁹ 關於伊斯特林悖論進一步的討論與介紹，請參考 Easterlin and O'Connor (20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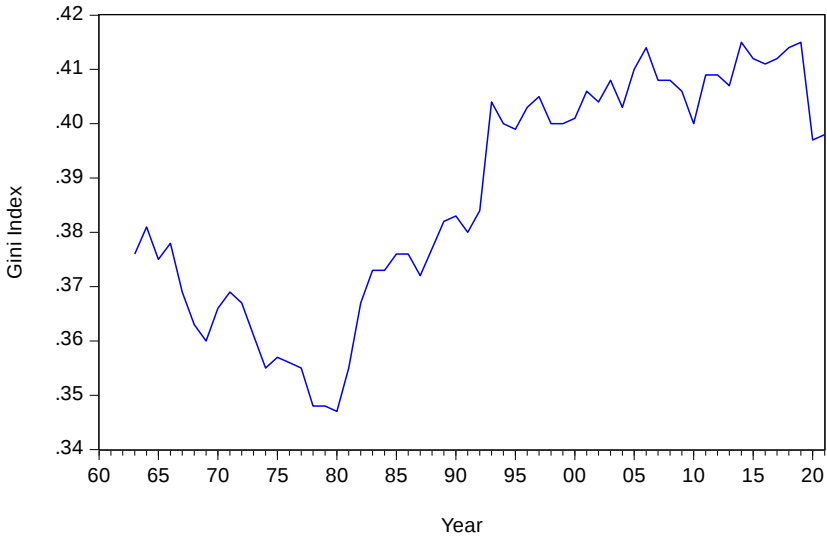
¹⁰ 請見 Stevenson and Wolfers (2008), Sacks et al. (2012), Diener et al. (2013) 等人的討論。

（2008）以 1958-1991 年的日本社會作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顯示日本自 1958 年以後實質每人國民所得呈現持續成長的趨勢，但同期間之國民生活滿意度並無明顯提升。日本國民之生活滿意度雖隨景氣變動而略有起伏波動，特別是在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出現，此時期不僅物價飆漲，而且伴隨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因此生活滿意度下降相當明顯。除去嚴重不景氣時期不談，長期而言日本國民生活滿意度仍維持相當穩定的水準，並未隨所得提高而出現上升的趨勢（圖十）。

另 De Neve et al.（2014）以希臘經濟為對象的研究發現，生活滿意度受景氣波動影響，若以景氣衰退對生活滿意度的負面衝擊和景氣繁榮所帶來的正向影響相對比，可以發現兩者對生活滿意度的影響是不對稱的。在 1981－2008 年間，希臘國民所得平均成長 50%，但整體生活滿意度大概是提高 5%－10% 左右；然而在 2009 年希臘債務危機發生，景氣出現大幅衰退的時候，國民所得水準跟著下降，但生活滿意度下降比所得下降來得更快、更多。其結論為所得和生活滿意度不必然有正向的關係，但是景氣不好的時候，生活滿意度一定會下降。

儘管全球工業化國家的每人國民所得自 1950 年後即出現加速成長的現象，但大部分國家的國內所得分配並未隨國民產出的成長而改善。常被用來衡量所得分配均等與否的指標為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或吉尼指數（Gini Index），吉尼係數的值介於 0 和 1 之間，該值愈趨近於 1，則表示所得分配愈不平均。

就美國而言，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全球經濟成長，其國內之所得分配有改善的現象，但自 1980 年開始其吉尼係數即出現上升之趨勢（圖十一），顯示美國國內的所得分配自 1980 年後逐漸惡化。



圖十一：美國之吉尼係數，1961-2021 資料來源：FRB St. Louis，作者繪圖

依據聯合國的 2022 年「全球多維貧窮指數（2022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顯示，全球人口中大約有 9.2% 或七億（700 million）的人口是活在極度貧窮（extreme poverty）的生活狀態。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中定義，一個人平均每天能夠用的錢不到 1.90 美元，即是活在極度貧窮線之下。¹¹而在美國 2022 年有 11.5% 的美國人，或是三千七百九十萬（37.9 million）的美國人是生活在貧窮線之下。以美國的一般生活物價水準而言，其貧窮線的標準為一年個人所得低於 13,590 美元，或三口之家的每年家戶所得低於 23,030 美元。¹²

¹¹ 請參考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網址：
<https://hdr.undp.org/content/2022-global-multidimensional-poverty-index-mpi#/indicies/MPI>

¹² 請見美國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如美國這般的長期富裕國家，其國內仍然有超過 10% 的極度貧窮之人。總結而言，1950 年代之後的全球經濟發展與所得增長，人類社會物質生活雖有改善，資本主義的市場制度或許可以調節供需，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市場卻無法在實現經濟成長的過程改善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

能夠追求無限的經濟成長和所得增長嗎？

人類社會長期追求經濟成長，但產出越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大，對地球的生態環境的衝擊就越大。大量的生產活動和消費所產生的廢棄和廢棄物，導致生態環境惡化，並且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排放量也隨著全球每人 GDP 的增加而增加，全球平均溫度自 1961 年至 1990 年間，已增加約攝氏 0.8 度左右，¹³ 而且目前全球溫度仍然緩慢持續上升中。此外，地球對人類的生態足跡（ecological footprint）承載力已於 1985 年前後達到 1.0。¹⁴ 生態足跡飽和點為 1.0，如果超過 1.0 表示對生態環境的衝擊已經超過地球所能承載的範圍。然而，目前生態足跡仍持續上升，因此，地球的生態環境能否支持人類社會的發展？長期以來的經濟成長是否仍然可以持續？這些問題都值得深思。

總結來說，就古典經濟學理論而言，提高所得才能得到更大的欲望滿足與機會，而更大的滿足就代表幸福感或福祉的提升。然而幸福感真是物質滿足能決定的嗎？莫說實證研究結果對此並無一致的結論。此外，過去百餘年間人類社會藉由追求

2022”。網址：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publications/2023/demo/p60-280.html>

¹³ 請參考 Our World in Data, Co²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網址：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2-and-greenhouse-gas-emissions>

¹⁴ GSA (2009), p. 12.

經濟成長來改善物質生活，在「人定勝天」的思維下，對「成長的極限」問題，並未特別在意。然而人類社會發展至今，不論是藉由市場運作來追求經濟成長作為提升經濟福祉手段的思維，或是藉由市場活動，追求財富累積或物質生活提高，並以之評估「成功」與否的價值觀，一直是社會的主流價值。但這些價值觀是否足以解決當前全球溫室效應、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或者是否也足以解決經濟成長的極限或幸福的不可持續等問題？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有所保留與遲疑，那麼主流經濟理論與主流價值觀是否需要修正？應如何修正？人類現有的知識，有無可供參考，藉以提供跨領域整合的可能？我們這一代的人，面對這些問題，是否也應思考自己的生命在這些問題中可能扮演的角色與貢獻？面對這些疑惑，我們先介紹 1960 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再來介紹佛教經濟學的濫觴。

二、1960 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反文化運動（counterculture movements）是反主流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運動，萌芽於 1950 年代的英國，當時反主流文化的青年拒絕父母那一代的文化標準，而後在 1964 到 1972 年間盛行於美國。其發展背景，主要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和西歐國家經濟穩定成長，出現大量消費的現象。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那一代開始反思社會現象，關心社會議題，對主流文化作批判。其關心的議題包括種族隔離、越戰、性解放、女權和物質主義等。主要的參與者是年輕白人，因為他們的家庭有錢、有閒，可以讓他們無後顧之憂地關心社會問題，其中的嬉皮（Hippies）是最大的反文化族群。反文化運動導致新的文化與

社會價值觀出現，基本上今天包括禪坐（**meditation**）、瑜伽，甚至占星這一類的活動，大概都是那時期對生命的迷茫和對自由的嚮往所引發而成風潮。

這個反文化運動，對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很大的影響。其中新左派（**New Left**）的出現，對 1970 年代的社會運動和政策運動，引領開端。此新左派與過去左派不一樣的地方在於過去的左派強調勞工運動，為勞工權利努力，而新左派關心的是自由，主張政府對社會不應該有太多的干預，因此也被稱為無政府社會主義（**libertarian socialism**）。此反文化運動時期的其他社會思潮還包括性解放運動、對環境問題的關心，以及反戰和反核等。

此反文化運動所帶來的最大影響是新媒體的出現，在過去媒體只有報紙，但 60 年代、70 年代開始出現電視、收音機。因為強調自由，所以反對審查制度（**censorship**），主張政府不應對新聞媒體進行審查。在當時的時空背景環境之下，出現很多新的自由思潮，包括前面所說的環境主義、新女性主義、女權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等等，都在 60 年代、70 年代蓬勃發展。

反文化運動在 1980 年逐漸銷聲匿跡，一方面因為他們主張的大多數目標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而且 1970 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帶來嚴重的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轉移了大眾對反文化運動的興趣，終使其逐漸式微。

三、佛教經濟學的濫觴

佛教經濟學（**Buddhist Economics**）也是在反主流文化思潮的時空背景下出現的思想，最早提出佛教經濟學一詞的是德裔英國劍橋學者舒馬赫（**E.F. Schumacher**）。1955 年他被派去緬

甸（Burma）做政府的經濟顧問，協助緬甸經濟發展。受西方主流經濟思想薰陶的舒馬赫到了亞洲的佛教社會，開始思考「西方主流經濟的價值在這個佛教社會真的是最好的嗎？」他認為好的工作（good work）對於人類的正常發展至關重要，而且相信利用當地資源從事生產來滿足當地需求是最合理的經濟生活方式。因此，開始構思結合佛教思想與經濟發展的發展策略，而「佛教經濟學」一詞最早出現在 Schumacher（1963）的短文。

此外，在 1973 年舒馬赫出版了後續的一本書：《小即是美：以人為本的經濟學》（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呼籲結束個人和生產者的過度消費現象，同時呼籲建立一種基於民眾需求（needs of people）而非企業需求的經濟準則。其主要思維，就是主張儉樸（simplicity）和非暴力（non-violence），認為在經濟活動的過程中，不應追求所謂的利潤最大化、滿足最大化，而應追求簡樸，也就是「夠了就好」，而不對生態環境造成傷害即是非暴力。他認為經濟學應重視地球上生命的價值，而非所得與利潤。他也譴責過度倚賴所得作為提升福祉手段，認為這會帶來過度消費、過度工作，以及資源的損耗的結果。因此，他認為最好的消費方式，就是以最少的資源使用來達到最大的滿足。

舒馬赫之後，西方的經濟學界以及南傳佛教的地區，開始有學者及宗教界人士推動佛教經濟學的研究，在南傳佛教地區更出現將佛教經濟學理念在世俗生活中落實的社區實驗。¹⁵

西方學界的佛教經濟學，挑戰的是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主流經濟學是以「自利心」為核心價值的市場經濟分析，在市場中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無盡欲望「滿

¹⁵ 請參考 Speece（2019）。

足的最大化」，不論市場、社會或自然環境，都僅是為了達成「最大化的工具」。佛教經濟學則對世間經濟活動提出不同的主張，認為人為經濟活動的本質是為了滿足生活之不足，而無窮的欲望是生活煩惱與不安的主因。為了降低生活的煩惱，應減少欲望，而降低苦惱則需在生活中實踐。因此，佛教經濟學主張經濟活動的目的在於苦惱的最小化、欲望的簡化和生活的儉樸，以及對環境和資源的非暴力原則。此外，相較於主流經濟學強調自利心，佛教經濟學主張對世間的真誠關懷、慈悲和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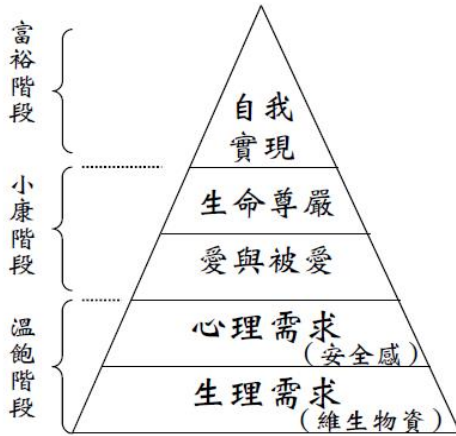
對於佛教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對比的入門有興趣者，可參考 Zsolnai（2007），至於對佛教經濟學理念的理解有進一步興趣者，請參考釋果光（2014）、Brown and Zsolnai（2018），以及 Payutto（1994）。

四、佛教經濟學與世間經濟學可以相通嗎？

佛教經濟學最近在西方學界逐漸受到一些人的重視，並試圖將它拿來探討當代的社經問題，因而成為經濟學領域中的一個「小眾文化」。然而，佛教和世間的經濟學有可以相對應的地方嗎？經濟學離不開人的生活探討，也離不開人的生存欲望滿足和生活幸福的追求；佛法也談人生，談欲望，更談幸福。因此，本文先探索佛法與世間法可以跨接之處，藉以瞭解佛教經濟學的核心主軸，其次再約略介紹目前流傳在西方學界的佛教經濟學內容。

佛法與經濟學均談人的生活、欲望與幸福，因此本文先從心理學的生存動機來談欲望與幸福，再介紹佛教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可跨接之處。

（一）從心理學看人的生存動機與幸福



圖十二：瑪斯洛（Maslow, 1943）的人類需求動機金字塔

圖表來源：作者繪製

人活在這個世間，有許多的欲望，也有生理、心理，以及精神上的需求。除了基本生活欲望滿足之外，還有其他的不同面向的欲望。Maslow(1943)的「人類動機論(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將人類的生存需求動機，自最基本的維持生活的需求開始，從低到高，依序分為五個層次，分別是：生理的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的需求(safety needs)、愛與歸屬感的需求(belongingness and love needs)、自尊與尊嚴的需求(esteem needs)，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ation)等五類。在需求金字塔的底層(圖十二)，是最基本的生理與心理需求，包括基本的物質生活所需、生活安全等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這是溫飽階段的需求。雖不必然在低層次的需求滿

足後，才會往高層次移動，但只有基本的生存需求滿足後才有時間與心力去思考高層次需求的滿足。¹⁶

在溫飽的階段，比較強調生理跟心理欲望的滿足，瑪斯洛稱之為「不足的動機」。等到溫飽之後，在小康階段會有更強的愛跟被愛的需求，也就是渴望群體的接納與自我的定位，以及生命尊嚴問題的需求，此為「心理滿足的需求」。等到非常富裕的階段，才會產生自我實現的追尋，此為「生命的需求」或「成長的需求」。人類的文化藝術活動的開展，都是自我實現所展現的不同面貌，如果不是在一個富裕的社會，不會有普遍的文化活動。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觀察，文化藝術或思想輝煌的「黃金時代」，大抵都是出現在太平盛世的時期。馬斯洛人類生存動機論的需求金字塔，並非說高層次需求必須在低層次需求滿足後才會產生，而是說在個人或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這些需求的強度也會不一樣。

從馬斯洛人類生存動機論來看，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其需求是物質與精神兼具的，隨著物質生活的富裕程度改變，精神生活的需求內容與強度也隨之改變。人在超越基本生存需求之後，顯現的內在生命成長的需求，這是主流經濟學所討論的需求內容所不足之處。再者，主流經濟分析以物質欲望滿足為「福祉」的指標，這僅是馬斯洛分析的最基礎生活和生存需求的滿足，而主流經濟學所謂的「幸福」，也僅是欲望滿足的「快樂」，其「滿足」僅是淺淺的幸福，無法說明高層次精神活動中的自我成長實現過程所獲得的滿足。

¹⁶ 對於瑪斯洛的人性發展動機說明，請參考許永河（2020）。

（二）佛教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可跨接之處

主流經濟學發展了二百五十餘年，有相當完整的分析與理論體系。相較於主流經濟學，佛教經濟學的立論仍尚未有效建立完整的思想體系與分析邏輯，但佛教經濟學出現的意義，不在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競逐主流經濟思潮，而是對當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提供異於主流經濟的替代思維，作為提升人類福祉的參考。此外，不論是主流經濟學或馬斯洛的心理需求的分析，對於內在「心靈」平靜所產生的另一層次的幸福感均未涉及，這是兩者所不足之處，而內在的心靈幸福，是宗教或哲學的範疇，也是結合佛法的佛教經濟學可能貢獻之處。

佛教經濟學是一種人在世間生活如何保持幸福可持續性的思維與生活態度，也是面對當代社經問題的參考策略。它與世間社會科學研究的差別之處，在於世間的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試圖就世間現象去探討世間現象的前因後果關係，藉此掌握事件變化的規則，進而建立邏輯推論的體系；然而佛教經濟學是建立在佛法的觀念來談世間經濟生活，解決生活苦惱。佛法，是心法，從因果、因緣法說明世間生死流轉的因果關係，以及出離世間生死煩惱的寂滅常樂之理。因此，想要理解入世的佛教經濟學的思想，應當掌握佛教的核心義理。

佛教經濟學不似主流經濟學試圖建立龐大的理論體系來分析人世間的經濟現象，而是從「心」開始，說明世間經濟生活的煩惱原因，進而說明在世間生活中減少煩惱的觀念與方法，以及提升幸福的生活方式。

佛教經濟學是從人類的精神與心理活動作出發，提出經濟在活動維持平安、富足與幸福，特別是對日常生活中的欲望、焦慮和自我實現等提出原則性的概念，並藉由這些原則性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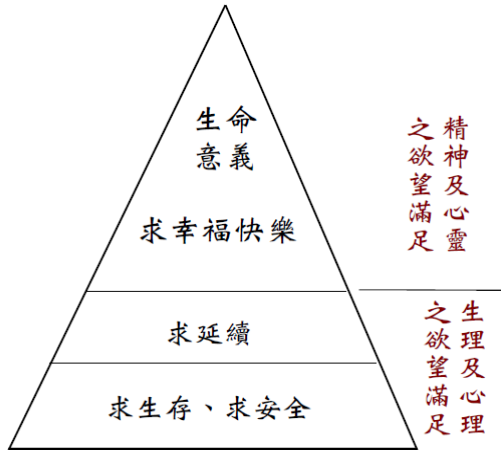
的實踐，達成經濟生活的滿足與幸福的可持續性。相較與傳統經濟學追求欲望滿足的最大化，佛教經濟學呼籲世人釐清欲望的本質，避免因為盲目追求欲望所帶來的煩惱，並建立世俗生活的正確知見，瞭解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環境是一體或整體性的，進而了知利人便是利己，自私自利最終傷害自己的福祉，並藉由實踐非暴力、關懷和利他來減少自己和所有有情眾生的苦惱。

雖然世間經濟學與佛教經濟學有所不同，但談到佛教經濟學與世間經濟學跨接之處，仍應就彼此共同的核心來思考。兩邊共同的核心議題，是人在生活中的生存、欲望與幸福的問題。

人類生命存在的一切活動，無非是為了求生存、求安全、求延續，以及求幸福。生活中的一切努力，首先要是求生存與安全，其次是求生命的延續。生命活動的目的，不僅是追求今天生活能過得去，還希望明天也能生活無虞；不僅是當前自己與親人能存活，還希望後代子孫還可以活得下去。活得下去、活得好，並活得幸福，這應該是所有人的共同欲望。一般人最低的生命層次欲望，是求生存和求安全，活命的基本欲望滿足之後才有餘追求延續的問題。至於幸福，在三餐無以為繼時雖然也會有追求幸福的夢想，但僅在活命欲望滿足後，追求幸福快樂、追尋生命意義問題才會變得比較重要，而且也才有餘裕去追尋。圖十三以「欲望滿足」為基礎，說明佛教經濟學與主流經濟學對「欲望」和「幸福」看法的異同。

「心理滿足」或「幸福感」有兩個層次：生理及心理欲望滿足的愉悅感，以及精神及心靈欲望滿足的幸福感。從人類生命中的活動來說，求存、求安、求延續是以生存物資的獲取與積累來實現，這些是基礎的生理及心理欲望滿足層次，而如何在生活中保持幸福快樂或追求人生意義，這已超越物質層次的

滿足，屬於精神及心靈活動的欲望了。



圖十三：生命中的活動、欲望與幸福層次 圖表來源：作者繪製

佛教經論¹⁷中說世間食有四種，分別是搏食、觸食、思食及識食。此四食之包含物質與精神面的欲望滿足，其功能不僅是長養色身，也長養神識。因此，佛法中說的「欲望」，包括物質與精神的欲望。然而，《攝大乘論釋》中說四食「令欲纏有情不淨依止而得住」¹⁸欲望滿足，雖帶來快樂，但快樂不同幸福，而且欲望的追求，卻是苦惱的根源。是故佛法教人要

¹⁷ 《佛說長阿含經・第三十經世記經忉利天品第八》云：「佛告比丘：一切眾生以四食存。何謂為四？搏、細滑食為第一，觸食為第二，念食為第三，識食為第四。」四食之說，另見《阿毘曇心論》卷十、《成唯識論》卷四。

¹⁸ 見《攝大乘論釋》卷第十。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三十一冊，No.1597。

「少欲知足」¹⁹，生活中要得到平安幸福，應以「八正道」²⁰作為營生的依歸，依八正道而行可以邁向生死解脫，得超越世間的涅槃福樂。然而，從佛法來說，人與人、人與社會和人與環境是一體不可分的，此一「依正不二」的思想²¹，也教導世人，若要追求幸福，必須要自利利他，也唯有自利利他才能夠實現究竟的幸福。當前西方被稱做「佛教經濟學」的著作，是在前述佛教思想的基礎上衍生出經濟活動的準則，包括儉樸、非暴力、煩惱最小化等主張（見 Zsolnai, 2007；Brown & Zsolnai, 2018），而「依正不二」思想也被應用在環境經濟學議題的討論上（見 Stanley et al., 2009）。

經濟活動是滿足生命存續需求的活動，因此從生命的活動來看，「欲望」與普世價值的「幸福」，是主流經濟學和佛教經濟學的第一個可相通之處。然而佛教經濟學的幸福內容，除了生理和心理欲求的滿足，含包括精神和心靈層面的滿足，但傳統經濟學，以經濟欲望滿足作為「心理滿足」或「幸福感」之依據，分析市場活動中如何達成「所得提高」、「財富累積」和「滿足最大化」目標的實現，這些都是偏重於基本的求存、求安、求延續的範疇，尚難處及精神和心靈的幸福。

從生命的活動來看佛教跟世間經濟學相通之處，是從最基

¹⁹ 《佛遺教經》云：「汝等比丘，當知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中略）汝等比丘，若欲脫諸苦惱，當觀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樂安隱之處。知足之人雖臥地上猶為安樂，不知足者雖處天堂亦不稱意。」大正新脩大藏經，第十二冊，No.389。

²⁰ 見《中阿含經·卷七分別聖諦經》及《增一阿含經》之〈四諦品〉。

²¹ 依報，指此身所依之處所，又稱器用世間。正報，指能依之五陰身，系業力感報之正體。「依正不二」指有情之正報身和此身所依止的環境間關係是二而不二的。

礎的欲望問題來探討；欲望之外尚有一個幸福的議題。幸福是放諸四海皆通的價值，然而怎如何生活才能幸福？這是佛教經濟學能夠跟世間經濟學相通並互補之處。以幸福為核心，相關可能整合研究的議題包括欲望（desires）、倫理（ethics）、消費（consumption）、生產（production）、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生態環境（ecology & biophysical environment），以及財富（wealth）等。這些議題中有屬於基本生活的議題，如生產、消費、欲望與幸福，也有延伸的近代熱門議題，如可持續性的發展與生態環境等。筆者提出這些議題供有興趣者參考，但受限於篇幅，在此不做詳細討論。

參、「佛教經濟學」—「正業」或「不務正業」，誰來定義？

一般人提到「不務正業」一詞，通常帶有一些負面的觀感在其中，例如遊手好閒，或擱下本職工作不顧，從事其他的事情。但世間所謂的正業或不務正業，通常帶有價值評斷在內。若與主流價值或行為相應的，通常被視為正業，否則即被歸類為「不務正業」。例如大家都認為經濟專業的畢業生應到金融或相關行業去就業，但是卻有一經濟系的畢業生卻去做燒陶的工作，就會被許多人視為不務正業。

既然大家都習慣以「主流」價值的角度來看正業與否，那麼，什麼叫主流（main stream）？依據劍橋大詞典（Cambridge Dictionary）的定義，所謂主流，是「大多數人接受的生活方式或信仰」；²² 也就是與大眾接受的價值觀或行為準則一致，便

²² 原文：“The way of life or set of beliefs accepted by most people”。

被視為主流。那麼，研究「佛教經濟學」算不算主流？

「佛教經濟學」不論從世俗經濟學界或傳統佛教圈內來看，都是「小眾」。因此，從事此一領域的研究，無疑會被歸入「非主流」研究之列。然而被歸類成為非主流，重要嗎？

若是從佛法來看，所謂主流與非主流的區別，是時間與空間關係的因緣和合而有。此種區別，既是因緣生，必然隨因緣離散而變化。因此，所謂主流在長時大空的環境中，隨時空環境的改變，可能淪為非主流，也可能進而消失不見；非主流也可能變成主流，但也有可能泯滅於時空洪流的變化中。

因此，憑藉眼前的主流價值來評斷「正業」或「非正業」，似乎也不必對其區分結果太過在意。需要在意的是「正業」也好，「不務正業」也罷，它對於我們生命的價值與意義何在？以及個人作此選擇在時空環境下是自私近利的抉擇？抑或是利人利己的決定？即或是所謂的「正業」，若結果是損人利己，或是損人不利己，則此種行為也是不足取的；即或是利人利己而顯孤寒的「不務正業」，也如一剪寒梅映冬雪，可以照見生命的價值與光輝。

另外，從世間經濟學來看，歷來有古典學派與凱因斯學派競逐主流思潮的位置，但除了古典與凱因斯兩大股主流之外，還有許多歷久不衰的非主流經濟學或異端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這些所謂的「異端」，包括馬克思經濟學（Marxian economics）、後凱恩斯經濟學（Post-Keynesian economics），它們主要探討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所產生的社會、經濟和金融不穩定的問題。而非主流中還有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此學派則是主張比古典更激進的完全自由市場制度，並據此建立理論。

相較於主流經濟學而言，非主流經濟學對同一事件，採用不同的分析方法、用不同角度的切入來解釋問題。儘管同樣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異端經濟學提出與主流經濟學截然不同、甚或與主流完全矛盾的理論、假設或方法，因而對資本主義社會或市場經濟的問題，得出迥然相異或更深入的分析。例如奧地利學派的景氣循環理論（the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²³和後凱因斯學派的明斯基金融不穩定假說（Minsky's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²⁴，它們對蕭條期的經濟現象提供了主流理論所欠缺的有力解釋。

異端經濟學的價值在於它對於世間現象，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問題，然後對這個問題的解釋彌補了主流經濟學欠缺的部分，並且提供另外一個對問題的認知、思考和解決的方向。它們可以補充主流經濟學對經濟現象無法令人滿意解釋的部分，甚或能對主流經濟學所忽略的經濟問題做出更深入的解釋，提供不同的解方。

然而不論主流或非主流的經濟理論，都是社會科學的理論；社會科學理論的出現，是要解釋時空環境底下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們應當瞭解，沒有哪一個時空環境是永遠不會變的；隨著時空環境改變，新的現象一定會出現，而新的思維方式也會出現。由於時空環境的轉變，只要能夠掌握問題的分析焦點，對現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能力，便能夠對現象的發展獲得話語權，而非主流也就變成主流。例如近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²⁵，在二、三十年前沒有多

²³ 請參考 Batemarco（1994）。

²⁴ 見 Minsky（1992）。

²⁵ 請參考 Hattwick（1989）。

少人對其關注，然而二十幾年後卻變成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獎學門，世人也肯定行為經濟學對金融分析的貢獻。所以只要真的下了苦功，論述也完整，並且對時空環境改變後的世間產生貢獻，非主流就有可能變成主流。然而若是論述僅是空泛而不具體，或者僅是蜻蜓點水，便會在時空環境轉變後，在時間潮流中被沖刷湮滅。

總之，不論從佛法的因緣觀來看，或者世間經濟理論發展的時空變遷來看，沒有永遠的主流，也沒有永遠的非主流。「不務正業」的非主流只要耐得住、耕得深，對世間有貢獻，都有可能變成主流，或者牽動主流的改變。因此，儘管「佛教經濟學」的研究被視為非主流，也不必太氣餒。

肆、「不務正業」變成「正業」，值得努力？

佛教經濟學的研究，是跨領域的研究需要對經濟專業的學識和佛法的內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瞭解，即或短時間內欠缺前述基礎，也要有興趣和熱誠，才能逐漸產出研究成果。從經濟學的專業來說，一個人耗費生命、時間與金錢去接受傳統經濟學的訓練，最終對經濟專業理論與研究方法稍的心得，已屬不易。此外，當前經濟領域對專業論文出版的要求標準較其餘社會科學領域更高，學者耗費精力從事「佛教經濟學」的非主流研究，不僅難以獲得主流學者的認同，更可能被貼上「不務正業」標籤而危及在經濟專業領域的聲譽和生涯發展。另外若是從傳統佛教徒的角度來看，浩瀚佛典的理解與修行法門的深入已甚困難，何況要耗費生命將「訶欲愛味，示欲過失，顯說雜

染、及清淨法，教導出離、及與遠離」²⁶等出離欲貪煩惱的佛法，和強調「追求欲望滿足最大化」、「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世間經濟學結合，把看似矛盾的「出離欲患」和「追求滿足最大化」這兩種價值體系融合而從事跨領域研究，也是極具挑戰性的工作。此外，當前世俗界或學術圈中追求近利和績效的社會氛圍下，耗費時間做整合研究，何時可以得到初步的產出，也有成本效益和工作安全保障的疑慮。這些問題，都是從事佛教經濟學跨領域研究學者所面臨的抉擇與難題。

然而主流與非主流是外在環境的分野，這種分野如果對我們有影響，是自己「選邊站」的結果。選擇與主流一致，固然可以得到歸屬感與群體的認同感，而且以多數人或權威的價值觀作為準則的好處，不僅可以降低自己的心理壓力，也可以增加安全感，得到心理的平衡。選擇隨眾，就如雁群飛行，隨著群體而飛行，可以增加安全感，減少對未知前方的焦慮。

選擇與主流一致而行，雖有好處，卻會影響個人的認知與判斷；即或覺知自己的看法和他人不同，卻仍選擇相信多數人的看法，這對學術研究的成長來說，是一種看不見的限制。

如果不選擇與主流價值一致而行，倒不必然就是挑戰主流，而是成為離群的孤雁。孤獨飛行，獨自承擔壓力、忍受孤寂，必須獨自認知環境、獨自判斷而前行。一路孤獨的鍛鍊，可能涵養出獨樹一幟的睿見，而成為新的引領群雁者，但也有可能成為一路獨飛的孤雁。

因此，佛教經濟學的研究到底是正業或不務正業，基本上是個人的選擇，但敢去做不務正業的研究，則需要有勇氣、有智慧，還要能安忍；要能忍孤寂、忍瓶頸、忍譏諷。孤雁的智

²⁶ 見《瑜伽師地論》卷第十三。CBETA 電子佛典集成，T30n1579_013。

慧，來自認清世間的真相，來自對自己的認識，從而找到「安身立命」的方向。面對任何內外困難，都能肯定自己而繼續前行，這是勇氣；而面對瓶頸與譏諷，雖知緣起幻化，卻能提起四念住來收攝身心，這是智慧的修持。這樣有勇氣、有智慧的孤雁，不論其所行是世間人眼中的正業或不務正業，對自己來說就不重要了。

做學問先不要去在乎主流、非主流的問題，應在乎的是我們對於世間現象的解釋，是否真正客觀與深入，並嚴謹的建構邏輯、建構分析架構來解釋現象。如果是這種態度的非主流，其實也有它的存在價值。

因此，不論是佛教經濟學也好，或者是社會科學的其他領域也罷，都是可以努力追求內在成長的著力處。在有限的生命過程中，先認清所謂主流並非永遠不變的主流，並在任一時空環境中，當下做能做、該做的事，從做中努力成長自我。不計較主流與非主流，或「正業」與「不務正業」的區別，在學習與成長的過程中，能夠將「自我」放得少一點，則與環境的互動和對環境的可能貢獻就會多一些。

世間沒有永遠不變的現象合理論，也無永遠的主流與非主流。因此，對於世間的變化，抱持著隨時接受結果的態度，當下努力學習。有安身立命的方向，能夠活在當下，努力在當下，努力完就放下。放下就無負擔，即便是不務正業也會很幸福。

伍、生命的終極正業：「三業」人生的終身學習

對許多人來說，一生的寫照就是不斷設定目標，不斷追求，以追求所獲得的「成功」來激勵自己不斷向前。然而不斷追求

的人生必然是幸福快樂的人生嗎？

人生有幾個階段，一般人在年輕的時候，精神充沛、體力充足，通常以追求為目標，這是「加法人生」。此時得到了固然歡喜，得不到必定煩惱；為了忘掉煩惱，便再設定另外一個目標來追尋。人在「加法人生」的階段只有得的決心，卻缺乏得與不得的智慧；得不到固然煩惱，得到除了短暫的快樂，也會有被奪的擔憂，同時下一目標的渺遠也令人不安。因為沒智慧，所以得也不安，失也煩惱。等到進入了中年，體力和精神都逐漸衰退，心力體力都不足的狀態下，想要的不一定能得到，而得到的也開始出現失散的現象，因此中年時期叫「加減人生」；在這個時期開始出現對生命徬徨的感覺，所以又被稱作「哀樂中年」。再老一點，生命進入高齡的暮年階段，身心已無法與年輕世代拼搏，僅能守成。日子多活一天，生命就少掉一天，生活支出多花一塊錢就是儲蓄減少一塊錢，此時期是「沙漏人生」。許多人在沙漏人生是孤苦老年期，默然回首多茫然。如果人的一生就是從「加法人生」到「加減人生」，再到「沙漏人生」，這樣子的一生大抵是「以苦為樂」的人生。如何才能避免落入以「不斷追求」卻無法阻止沙漏的「以苦為樂」生命窠臼？

當代社會是功利主義的社會，「速食文化」是當代價值觀的寫照。在目前的社會中，不論做任何事，人們通常期待很快地看到想要的成果。因此在學校中年輕的學子對一些課程會問：「學這些東西對我未來就業、賺錢有什麼用？」如果以這種態度來看學校的正規課程，顯然許多課程對賺錢是沒有立即而顯著加分功用的。然而賺錢就是生命與學習的目的嗎？學習的主要功能又是什麼？財富對生命有何意義？

不僅一些年輕人會有功利主義的想法，某些學佛的成年人也有類似的速成心態。聽過有人這麼說：「人生已經很苦了，來學佛為什麼還要辛苦學這麼多名相和知識？有無讓我即刻離苦開悟的方法？」其實，我們應該深思：想要離苦，苦從哪裡來？離苦得樂的觀念與方法需要學習嗎？離開學校後的成年人就不必有學業了嗎？

人生，本來就是一個不斷學習與成長的過程；在學校中學知識，離開學校後在生活中學習智慧與人品的涵養。或者也可以說，人生就是不斷學習認識自我、成長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一個過程，而豐富的人生是職業、事業和學業這「三業」並進的人生。

人的一生不管是主動或被命運左右而選擇在主流或非主流的哪一邊，也不論是從事所謂「正業」或「不務正業」的工作，都必須或不得不在所選的路上走下去。生命過程中，如能體會一路上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成長，而且不斷學習，這樣的生命過程便會更加豐富與踏實。因此，人生的「終極正業」是在生命過程中實踐「三業並進的人生」。

為什麼要談職業、事業和學業這三業？人活在世間，需要有經濟收入來維持生活之所需，因此要有一份能夠養家活口的「職業」。但光是三餐溫飽，勞勞碌碌過一生，為名利而奔波，生命必然疲憊，生活也會失掉方向感，感覺一生過得勞苦且缺乏意義。因此在生活溫飽之外，還要掌握「安身立命」的方向，才會活得積極而踏實。這個「安身立命」的方向，就是「事業」，值得自己一生去開拓、探尋，去尋求此生生命價值的實踐。此外，為了職業的穩定與安全，以及事業的發展，就必須不斷地學習成長，這是「學業」。學業有兩個面向：一個是外學，一

個叫內學。外學是學習世間有用的知識，也就是工作和生活中與時並進的知識；內學則是自我探索、自我消融、自我成長。能夠把這個「我」看得透，看得清楚，才能夠真正的平安、幸福。三業具足的人生，才會是豐富且不留遺憾的人生，而理想的人生是「三業兼顧」的人生。

平安幸福的人生，除了前述的兩種學習之外，還要學習「減法人生」，亦即學習降低欲望，消去煩惱。減法人生能夠減少煩惱，增進心靈的安定，心靈安定才能夠有光明的人生，而身心光明才会有平安、幸福、快樂的生活。所以，學習活在當下，做到得失無礙，才能夠真正離苦得樂；而三業並進的態度，可以幫助我們在人生路上走得穩、走得遠、走得平安。

參考書目（References）

中文

釋果光（2014）。《心靈環保經濟學》，台北：法鼓文化。

許永河（2020）。〈經濟富足與心靈安樂——聖嚴法師「心靈環保」思想對「佛教經濟學」理論之啟示〉。《聖嚴研究第十三輯：聖嚴法師圓寂十週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法鼓文化。

外文

Batemarco, Robert J. (1994). “Austrian business cycle theory,” Chapters, in: Peter J. Boettke (ed.), *The Elgar Companion to Austrian Economics*, chapter 32,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Brown, Clair & Zsolnai, L. (2018). Buddhist economics: An overview. *Society and Economy*. 40. 497-513.
10.1556/204.2018.40.4.2.

De Neve, Jan-Emmanuel and Diener, Ed and Tay, Louis and Xuereb, Cody (2013). “The Objective Benefit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Helliwell, J., Layard, R., & Sachs, J., ed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3*. New York: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2306651>

Diener, E., L. Tay, and S. Oishi (2013). “Rising Income an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N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4 (2): 267–76.
doi:10.1037/a0030487. PMID 23106249. S2CID 3255125.

Easterlin, R.A., O’Connor, K.J. (2022). The Easterlin Paradox. In: Zimmermann, K.F. (eds) *Handbook of Labor, Human Resources and Population Economics*. Springer,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57365-6_184-2

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Paul A. David; Melvin W. Reder (eds.).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Frey, Burno S. (2008). *Happiness: A Revolution in Economics*, MIT Press.

GSA (2009). *The New Sustainable Frontier: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vailable at:
<https://www.wbdg.org/FFC/GSA/newsustainablefrontier.pdf>.

Hattwick, R.E. (1989). “Behavioral economics: An overview.” *Journal of Business Psychology*, 4, 141–154.
<https://doi.org/10.1007/BF01016437>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version 2020. Bolt, Jutta and Jan Luiten van Zanden (2020), “Maddison style estimat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A new 2020 update ”.

Available at:

<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publications/wp15.pdf>

Maslow, A. H. (1943).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370-396.

Minsky, Hyman P. (1992). The Financial Instability Hypothesis .

The Jerom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74,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6102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161024>

Payutto, P. A. (1994). *Buddhist Economics. A Middle Way for the Market Place*. <http://www.geocities.com/Athens/Academy/92>

Sacks, D. W., B. Stevenson, and J. Wolfers (2012). “Subjective Well-Being, Incom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n Philip Booth (ed)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ell-Being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pp. 59–97.

Schumacher, E. 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Harper & Row.

Schumacher, E.F. (1963). “Buddhist Economics” in Guy Wint (ed.), *Asia: A Handbook*. London: Anthony Blond Ltd.

Speece, M. (201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Buddhist Economics in Thai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DOI: 10.1108/IJSE-08-2018-0405,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351408>

Stanley, J, Loy, D.R., and Dorje, G. (2009). *A Buddhist Response to the Climate Emergency*. Wisdom Publications.

Stevenson, B., and J. Wolfers (2008). “Economic Growth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assessing the Easterlin Paradox”.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 1–87.
doi:10.1353/eca.0.0001. JSTOR 27561613. S2CID 244381151.

UNDP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OPHI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2022) . *2022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Unpacking deprivation bundles to reduc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New York.

Zsolnai, L. (2007). Western economics versus Buddhist economics. *Society and Economy*. 29. 145-153. 10.1556/SocEc.29.2007.2.2.